

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

李孝悌*

從一九〇〇年之後，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西學「普及化」的趨向，這個普及化的趨向，除了表現在「開民智」或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外，也可以從一九〇〇年代大量出現的教科書和百科全書窺見端倪。這篇文章打算對這些百科全書的作者和內容，做一個概括式的介紹、分析。

大致上，我將這些編纂者分成四個類型：（一）外交官與上層士紳，（二）維新派，（三）留日學生，（四）新型文人。在每個類別下，我挑選了一、兩位資料較詳備，又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作比較深入的討論。最後，我則試著將這些百科全書家放在一個較寬廣的歷史脈絡下，對西學的傳遞和積累過程，作一個概括的分析。

由於處在發展階段，這些百科全書的格式、內容游移而難以精確統一的界定。同樣的，編纂者的身分、認同也頗為歧異。不過，這些人雖然在政治信念、專業訓練和立身謀生的技能上各自不同，卻共同為晚清的知識分子開闢了一片嶄新而醒目的新疆域，並藉著一套新的書寫類型，為近代中國建立了另一種可能的啟蒙之道。他們充分掌握了時代動向和市場需求，一方面總結了前此的西學知識，一方面也為五四時代的科學、民主、男女平權，和西方物質文明的優越性等新思潮，作了發凡奠基和潛移默化的工作。

關鍵詞：百科全書 西學的普及 上海 出版 新的知識類型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壹・一個新的知識類型

從一八一〇年代開始，各種西方新式的傳播工具（如宣傳小冊、書籍、每月定期出版的期刊、商業報刊），逐漸在中國外圍的南洋、港澳一帶出現。此後到一八九五年止，由南而北，由邊緣到中央，由租界到內地，各種傳播機構，如印刷所、新式學校、出版社、翻譯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斷出現。¹ 不過就像李仁淵所說的，在這八十多年間，儘管有許多中國人開始接觸到這些新式的傳播媒介，並藉此對西方的器物技術、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這些文化輸入卻並未對中華帝國的主幹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居於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階層，仍然對這些新事物視若無睹。² 一八九五年後，情勢顯然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西學」開始成為知識界的新「論域」(discourse)。³ 一方面，新型報紙、學堂和學會大量出現，⁴ 另一方面，隨著「強學會」的成立，原來位居邊緣的新式報刊，從香港、上海等華夷雜處的商業城市，直搗政治中心的北京，並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⁵

在這個西學由邊緣而中央，新式報社、學堂、學會大量出現的深化過程外，我們也同時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西學「普及化」的趨向，這個普及化的趨向，除了見諸一九〇〇年之後，我所謂的「開民智」或下層社會啟蒙運動外，也可以從一九〇〇年代大量出現的教科書和我在本文中所討論的百科全書窺見端倪。

「百科全書」一詞作為一個新的中國詞彙，首見於一八九七年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⁶ 鍾少華在《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一書

¹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23-28；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二、三章對這個過程有更詳細的討論。

²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頁22-23。

³ 參見拙著，《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3-14。

⁴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1978）：480-482。

⁵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頁107, 113。

⁶ 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1911）〉，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35-136。更進一步的討論，見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M. Henri Day, "An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edia (1911): An Unfinished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odern

中，第一次對在晚清出現的這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型，作了界定和較全面的介紹。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將百科全書和當時盛行的另一種叢書型式——《皇朝經世文編》——相對比，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書作為一種新型類書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別是一八九〇年代之前——的「經世文編」是將當時人的時論、奏摺、文件全數照收，雖和洋務、富強之道有關，但多半長篇累牘，全文登錄，不太為讀者的需求設想。⁷「經世文編」作為一個編纂文章的類別，從《皇朝經世文編》到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受賀長齡之命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在理念、體裁上大體一貫相沿，沒有什麼變化。但從一八二七年魏、賀版之後，到一八九〇年代，甲午之戰前後大量出現的各種新編、續編、續新編等不同版本的經世文編間，在內容乃至體例上，確實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⁸一方面，有些版本，像一八八八年葛士濬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續編》在傳統照六部分門別類、架構知識的基本體裁外，增列了洋務一類，並在內容上呈現少數、個別和百科全書類似的風格。而甘韓主編的《皇朝經世文三編》，更逕以《皇（清）朝經世文新增時洋務續編》為書名；⁹另一方面，這個不斷隨著政局加速演變而與時俱進的

European Culture”，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世的百科全書」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10月5-7日）。日本人在一八七三年最早鑄造了「百科全書」一詞；見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6），頁19, 121。就像晚清的許多新詞彙一樣，康有為輾轉將「百科全書」一詞引進中國。一九〇七年，嚴復寫了一篇短文，〈書「百科全書」〉。雖然題目就叫百科全書，但嚴復對 *encyclopaedia* 的譯名，似乎還是有不同的看法，先是音譯為「嬰塞覺羅辟的亞」，又意譯為「智環」和「學郭」。事實上，商務印書館在一九〇二至〇三年間已將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譯為《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發售。但從嚴復的文章，及一九〇〇年代各種不同的用詞來看，「百科全書」一詞，一直到一九〇〇年代，仍未變成唯一標準的譯名。相關的討論見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頁138-139。

⁷ 鍾少華試著從內容、形式和作者的身分等幾方面，討論百科全書和經世文編之間的本質性差異；見《人類知識的新工具》，頁97-104。

⁸ 黃克武曾對一八二六到一九〇三年出現的各種名目的經世文編，作了一個簡表；見〈經世文編與中國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86-87。Andrea Janku 對這些前後出版的文編，有全面、深入的分析；見“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1-3（2004）：72-76。

⁹ 葛士濬主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及石印本影印，1979），共有一百二十卷，洋務部分佔了二十卷，可見其份量。其中的內容包括了奏摺、條約全文、策論、丁韋良關於領事官責任的譯文等，不一而足，不像百科全書一樣有著較一致的體例。但其中偶爾穿插的條目，像卷一一九的「論今南洋各

傳統類書類別，也與新的大眾媒體——報紙——發生密切的關係，而出現一種跨越文類的現象。Andrea Janku 在仔細的比較了太平天國之亂以降到二十世紀初的各種經世文編和報紙文章後，特別指出就內容而言，報紙的時論文章和經世文編中的文章，有越來越接近的趨向，這種現象在十九世紀末以後特別明顯。一方面，報紙的政論文章有很強的經世色彩，另一方面，從一八八〇年代後期開始的許多經世文編，都收列了報紙上發表的經世文章。¹⁰

不過儘管經世文編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初之間，在內容上有所轉變。但大體而言，在呈現方式和知識的廣博度上，都和百科全書有著極大的取向上的區別。西方的百科全書一方面要不斷容納更多學門和更廣泛、即時的知識，一方面卻又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閱讀和吸收，利用個別的條目、字母順序的排列、大量的圖表和通俗的語言等形式，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廣博的知識領域。¹¹

我在本文中對百科全書家（包括編者、譯者及作者）的討論，基本上就以鍾少華書中所提到的各種類型的百科全書（包括百科全書型、專門百科全書型、百科辭典型及所謂的過渡型）為基礎，略作損益而成。大致上，我將這些編纂者分成四個類型：（一）外交官與上層士紳，（二）維新派，（三）留日學生，（四）新型文人。這四個類型雖然各有指涉，但彼此間也有重疊之處，有些編纂

島國」「五印度洋形勢」「騰越邊徼」「西域形勝」等，卻已約略有了百科全書的味道；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三，頁3167-3177。年代愈往後，這樣的色彩越明顯。例如甘韓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皇朝經世文新增時洋務續編》，在洋務的幾卷中，分別包括了「列國編年紀要」「教派考」「風俗考」「刑禮考」「電線電局考」「（各國）軍政考」「英國鐵路考」等，已經和我們下文中要討論的百科全書的內容和呈現方式頗為類似；甘韓，《皇朝經世文新增時洋務續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十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第801種，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掃葉山房活字版排印本影印），卷二三，頁405-488。甘韓、楊風藻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編的另一本《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則在各卷的相關條目中，先收列奏章，再分別介紹各國的情形，包括了官制、各國的學校、農會、工藝、商務、郵政、軍政及沿革，可以說是傳統經世文編和百科全書的混雜綜合版；甘韓、楊風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商絳雪齋書局石印本影印，1979）。

¹⁰ Janku,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 68-72, 81-91.

¹¹ 米列娜對此作了非常精扼有力的分析；見 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Day, "An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edia (1911)," pp. 2-3.

者同時具有兩種乃至三種身分。在每個類別下，我挑選了一、兩位資料較詳備，又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作比較深入的討論。最後，我則試著將這些百科全書家放在一個較寬廣的歷史脈絡下，對西學的傳遞和積累過程，作一個概括的分析。

貳・百科全書家的身分

一・外交官與上層士紳

在這個範疇內的編纂者中，馬建忠（1845-1900）和錢恂（1854-1927）顯然有許多類似之處。二人都來自相對顯赫的家族，但都在正規的科舉仕進之途上受到挫折，轉而涉身洋務，留學、出使各國，並分別成為李鴻章和張之洞的洋務幕僚，又同時在政治活動外，從事新知識的介紹和編纂活動。

馬建忠出生在江蘇丹徒（今鎮江市），原籍丹陽馬家村。其先人早在明末時，就在利瑪竇赴丹陽傳教後，皈依天主教。太平天國之亂後，馬建忠的二哥馬相伯進入上海徐匯公學就讀，馬建忠隨後也受戰亂影響，進入徐匯公學。咸豐十年（1860），屢試不第的馬建忠，在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士大夫卻絕口不談洋務的刺激下，決定放棄科舉仕進之途，轉而致力洋務。¹²

一八七七年，在李鴻章的賞識和推薦下，馬建忠以中國第一任駐法國外交官隨員的身分，和福州船政學堂的首批留歐學生出洋。¹³ 和他同行的除了嚴復外，還有同樣以隨行翻譯身分，出身福州船政學堂的陳季同。馬建忠並奉李鴻章之命，和陳季同一起進入巴黎政法學院攻習公法。¹⁴ 陳季同之弟陳壽彭也被歸入百科全書家之列，在下文中將會進一步討論。馬建忠在一八八〇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隨即回國，在天津謁見李鴻章，成為李的幕僚，時年三十六歲。此後直到一八九〇年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為止，是馬建忠在中國致力洋務推動的時期。一八九一至一九〇〇年過世為止，馬建忠定居上海。因為政治上的失意，轉以著譯為業。除了《馬氏文通》外，並編纂了九十五卷的《藝學統纂》。這本被鍾少

¹² 參見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驅者的悲劇角色：馬建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16-24, 214。

¹³ 同前書，頁10。

¹⁴ 參見前書，頁217-218；岳峰，〈東學西漸第一人——被遺忘的翻譯家陳季同〉，《中國翻譯》2001.4：54-57。

華歸入「專門百科全書型」的長篇鉅著，在馬建忠過世後兩年，由上海文林書局石印刊行。¹⁵ 正好是百科全書大量出現的高峰。

根據羅振玉為此書寫的序，我們知道這是馬建忠「平日隨手記錄之作」。¹⁶ 共分為十四類，分別是天學、地學、測繪學、製造學、算學、礦學、聲學、光學、電學、化學、汽學、重學、農學和醫學。¹⁷「藝學」作為一種詞彙，在晚清的百科全書中似乎格外受到重視。比《藝學統纂》早一年出版，由何良棟主編的《泰西藝學通考》即是一例，包含的知識類別也大抵相同。另外一本同樣在光緒二十八年出版的百科全書，則名為《五洲政藝撮要》。¹⁸ 藝學的受到重視顯然和戊戌變法以後，考試內容的改變，由八股策論旁及泰西藝學有關。¹⁹ 在徐毓洙為《泰西藝學通考》寫的序裡，我們可以看出「藝」基本上是作為「道」的對立面而存在，內容包括了西方人素來重視的工藝。洋務運動中建設的船廠、製造局、電報、鐵路、郵政，²⁰ 就是藝學的具體實踐。

當時一般人多將藝學和洋務、時務或西學畫上等號，但對「歐學」有第一手認知的馬建忠，卻認為對「實學」的講求，並非西方人格物致知之學所專擅，中國古代對利用厚生、製器、稼穡之學的重視，其實和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學有一貫之處。和馬建忠在上海一度毗隣而居，時相往還的羅振玉，對馬建忠的想法深感契合，所以在序中特別對此加以闡述：

每相見，輒商榷古今，以適用之學相砥厲。嘗謂西人以格物致知為學，實與我中國古者利用厚生之旨有合，乃今人多以形下之學輕之。抑知我上古製器創物之聖人，實與教稼明倫者並重，固無分軒輊耶！²¹

¹⁵ 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驅者的悲劇角色》，頁10-11, 221, 236。

¹⁶ 馬建忠，《藝學統纂》（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文林書局刊本，1902），〈羅振玉序〉。

¹⁷ 我這裡用的是上海圖書館的藏本。

¹⁸ 本書的編者為肖德驥，鍾少華認為是仿照江標的編書體例編寫，可能是學塾本。內容除了公法、學制、禮制、官制、軍制等「政」的範疇外，還包括了聲、光、化、電、動植物等，馬建忠稱為「藝學」的知識；見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頁58。

¹⁹ Benjamin Elman 對甲午戰爭之後到一九〇五年間，各種關於科舉的改革建議，以及這段時間內科舉考試中的西學試題，作了全面的分析；見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585-602.

²⁰ 何良棟輯，《泰西藝學通考》（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鴻寶書局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徐毓洙序〉。

²¹ 《藝學統纂》，〈羅振玉序〉。

我們仔細翻讀《藝學統纂》一書的內容，發現馬建忠不僅對西方的技藝之學有清晰的勾勒，對墾荒、屯田、蠶絲、樹桑等中國歷來統治者所重視的課題，及其改進之道，也反覆致意，完全符合了羅振玉在序文中的陳述。作為一名精通西學，又實際涉身洋務的官員、士紳，馬建忠藉著這套平日隨手記錄，而具有條理的鉅著，同時呈現了他百科全書式的西方知識及強烈的經世之心。

《藝學統纂》的開本不大，類似商務印書館日後出版的袖珍型文庫，前二冊為總目和細目。全書無標點，但有些條目用空格或圓圈來區分，以利閱讀。條目的名稱獨自成行，每個條目或一百字、或二、三百字，長者約千餘字，短者不及百字。〈醫學卷〉的條目從「英人運動各法」、「不運動之弊」、「英國食物分三類」談到「肉食食麵分配之理」和「茶與加非之益」，²²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西方人的醫學知識、養生之道和飲食習慣在這個留學生身上的影響。

在電氣部分，馬建忠用了幾個不同的條目，分別介紹了「銅絲傳電氣」的一些基本原則，海報電報繩的速度，海底電報的緣起、類別。並用簡單的條列，統計了咸豐十一年為止，西班牙、法國和各國電報公司所建深海電報的分佈和里數。²³ 在火車（蒸汽車）部分，則用了三十幾個條目，介紹了西方從一七〇〇年開始，到一八七〇年代為止，各個階段的創新和發展。合在一起，等於是西方蒸汽車的發展簡史。²⁴

電報、火車是馬建忠參與的洋務運動中的主要建設，他在平日的記錄和摘選中，將許多包含技術細節的資料選入，充份透露了一生關注和志業所在。另一方面，卷五〈農學〉部分的內容，則反映了和西方格物致知之學相對應的中國經世致用之學的傳統。但作為一名對西方科技、工藝有深切體認的西學家，馬建忠對中國厚生、稼穡之學的敘述、評論和建議，顯然又超越了中國傳統士紳有關育蠶、樹桑之學的論述模式，而有了現代農技改良的色彩。「中國育蠶宜求善法」一則，對中國蠶、絲的特長、病害及改良之道的論述，最足以顯示《藝學統纂》一書，如何既掌握專業知識的細節，又同時具備國際性的視野，而將中國傳統的農業論述帶入一個新的層次。²⁵

²² 《藝學統纂》卷一，頁8b-11b。

²³ 同前書，卷四，〈電學〉，頁10b-13b。

²⁴ 相關的記載，見前書，卷五，頁5b, 10a, 11b。

²⁵ 相關的記載，見前卷，頁7b。

錢恂雖然出生略晚，但和馬建忠可算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物。他的家世更為顯赫，伯父錢振倫在道光十八年（1838）和曾國藩一起中進士，妻翁氏是翁同龢的姊姊，父親錢振常則是同治十年進士。²⁶ 小他三十幾歲的弟弟錢玄同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名的疑古派。錢恂在十五歲時考過生員，但此後屢試不中，被迫放棄科舉正途，游於薛福成門下。薛福成曾先後在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中供職近二十年，光緒十五年（1889）奉清廷任命為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欽差大臣，因故改於第二年由上海乘法國郵輪赴任。²⁷ 下文中會提到的不第文人鄒弢就是在這個時候，帶著自己編纂的《萬國近政考略》，在上海求見薛福成，並受到薛的賞識。錢恂則於此時，以門生兼隨員的身分，隨薛出使歐洲。²⁸

和馬建忠作為第一任駐歐大使郭嵩燾的譯員相比，晚了十多年多赴歐的薛福成和錢恂都可以看成第二代的駐歐外交官。一八九〇年，錢恂奉調赴俄羅斯，成為駐俄使館的參贊。一八九三年，出洋三年期滿回國。接著，在翁同龢的關說協助下，再度被派往英國。一八九五年，錢恂以通曉西學，被張之洞調請回國，成為張的幕僚，並開始結交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和夏曾佑、汪康年有緊密的交往。²⁹

在幕府任內，錢恂受到張之洞的高度賞識。一八九九年，張之洞以「學生游學，關係重大」，派錢恂為游學日本學生監督。留日期間，錢恂一方面作為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卻同時和當時旅居日本的梁啟超、孫中山互相往來，並對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保持同情。下文中會提到的《新爾雅》的編者汪榮寶、葉瀾，以及錢恂的女婿董鴻禕，也都在這一段時間內赴日留學。一九〇三年，錢恂再度展開外交使臣的生涯。一九〇七年，被任命為出使荷蘭和義大利的大臣，政治生涯達到最高峰。³⁰

錢恂以一介不第秀才，而終能攀升到二品出使大臣的高位，相對於馬建忠而言，更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也為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讀書人開闢了科舉仕進之外，另一條晉身的道路。不過也許正因為錢恂早期近乎邊緣的身分，讓他在過去關於

²⁶ 錢恂，《吳興錢氏家乘》（收入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心編，《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34冊），〈說明〉，頁1-2。

²⁷ 見蔡少卿，〈薛福成日記·序言〉，《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2（2005）：14-15。

²⁸ 丁鳳麟，《薛福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07。

²⁹ 本節取自邱巍，《吳興錢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05），頁34-35。

³⁰ 同前書，頁37-38。

洋務運動和晚清思想的研究中，一直沒有浮上台面，反而是他的妻子單士厘的經歷和著作，因為在婦女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而受到更多的重視。³¹但從晚清百科全書編纂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卻能對像錢恂這一類非正途出身的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西學知識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評價。他不但和積極參與革命運動的女婿董鴻禕合編了《日本法規解字》，並在一九〇一年分別出版了《五洲各國政治考》及《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兩種百科全書類著作。³²

《五洲各國政治考》的特殊之處，在於作者是根據自己對歐洲各國和日本上層政治的親身了解，作了一手的記述，和當時一般侈談洋務，勒為成書，卻無法掌握到各國「政治大端」和「制作之原」、「振興之本」的現象很不相同。³³錢恂在《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的自序中，對自己根據親身經歷，撰寫這套叢書的過程，有相當生動的描寫：

往年隨使英、法等國，公餘之隙，惟以采問其政俗為事。凡曾確聞暨目擊者，筆諸於書。六年報滿回華。又奉張孝達督憲，檄使日本。彼國風景人物，固予所心儀而神往者。一旦得此契意之事，興更勃然。到差後，得獲與彼國士大夫游。見其政治之美，備于是，擇要訪錄，積稿成卷。³⁴

錢恂先後駐節歐洲和日本，對東西列強政治制度和先進文明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外交使節圈中，確實是少見的例子。他把握這個難得的際遇，用心採訪、蒐集資料，對各國的政法制度、風俗習慣，作了寬廣而扼要、生動的介紹，在很多方面都具備了百科全書的基本質素。

不過在進入錢恂所勾勒的百科全書式的圖景之前，還是有必要對這套著作中承續傳統的一面略加說明。事實上，《五洲各國政治考》和《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可以說是依照兩套不同的標準來編寫。前者已體現了百科全書的理念和設計，後者則保留著《皇朝經世文編》的架構。其中卷一三到一六介紹西方列強軍政的部分，依條目編寫，格式近乎《五洲各國政治考》，其他介紹中國新政的各卷則是奏摺、資料的彙編，和百科全書的精神大相悖離。

³¹ 參見邱巍，《吳興錢氏家族研究》，第四章；齊國華，〈巾幗放眼看先鞭——論錢單士厘出洋的歷史意義〉，《史林》1994.1：34-40。

³² 錢恂，《五洲各國政治考》（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海德堡大學的百科全書資料庫中有兩套書的掃描本。

³³ 見陳洙珠為《五洲各國政治考》寫的序。

³⁴ 《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自序〉。

《五洲各國政治考》共八卷，總目部分仍依照中國政治的框架，分為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六個類別。但細目和內容則已是近代百科全書的撰寫方式。如卷一〈吏政〉下共分三十六個條目，簡要地介紹了三十六個國家的政治，從日本、美國和歐洲列強到非洲的埃及、南美洲的秘魯、智利、烏拉乖（今烏拉圭）、中亞的阿富汗，涵蓋甚廣。每個條目各有標題，內容以二百至三百字為度，少的如越南，不足六十字；長則如德意志，約四千字左右。內文雖無標點，但文字其實淺顯易解，「德意志」條下的開頭如此寫道：

日耳曼合眾國，近存二十有五。各國連橫，互相保護，冀國強盛。七十一年四月新定章程，推奉布國王總領日耳曼各國，改號德意志，國名曰德意志蓋薩蓋薩猶云皇也。章程內第十一條，凡合眾各有遇交涉外國事宜，及出令派守地方，立約議和諸務，均由德意志蓋薩主之。若有出師外國之舉，則必與總議院大臣酌定，然後施行。總院分上、下兩院。³⁵

短短一百多字，已將德國的組成和基本的政治運作模式，勾勒出一個明確的輪廓。

除了基本的政體和制度介紹，錢恂對各國的基礎設施、鐵路、電線等也有即時而扼要的敘述，大概由於曾經奉派到日本，掌握了最新的資訊，所以在這個部分的介紹格外添加了數字的細節：

東京新橋至橫濱港，延長十八英里每英里合中國三里三。明治三年三月起工，五年九月成。停車場七，曰新橋、曰品川、曰大森、曰川崎、曰鶴見、曰橫濱。建設費二百八十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五元，每一英里合十五萬八千零十六元。神戶至大津共延長五十八英里……³⁶

但在這些細微的數字外，錢恂卻往往又能以洞識全局的眼光，掌握到這些新政建設的基本命意所在：

日本之創建鐵路也有兩意焉：一曰保國，務使東西京聲勢聯絡，呼應靈捷。推而及之，各大碼頭、各大省會，皆聯為一氣；一曰養民，欲使遍國之地，血脈貫通。商人轉運，貨物腳價，省於昔者十倍。民間所需物價，皆賤于前，商民兩便。截至前年為止，共成鐵路三千三百餘里。核諸日本全國形勢，原係由西南通至東北，極長之海島鐵路，則由北至南以為幹路，而四旁另開枝路。³⁷

³⁵ 《五洲各國政治考》卷一，頁5a。

³⁶ 同前書，卷八，頁1a。

³⁷ 同前卷，頁1b。

從諸如此類淺簡、扼要卻能掌握全面形勢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瞭解到錢恂為何能以一個秀才出身的下層士大夫，在四十幾歲的壯年，就以精通西學的聲譽馳名於世，而受到張之洞等人的不次拔擢了。張之洞在保舉他的奏摺裡所作的各種形容：「該員中學淹通，西學切實，識力既臻堅卓，才智尤為開敏。歷充歐洲各國出使大臣隨員、參贊，于俄、德、英、法、奧、荷、義、瑞、埃及、土耳其各國俱經游歷，博訪深思。凡政治、律例、學校、兵制、工商、鐵路靡不研究，曉其利弊，不同耳口游說，洵為今日講求洋務最為出色有用之才。」³⁸ 在我們閱讀《五洲政治通考》的過程中，可以明確地體現出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不僅對西方及各國的政法、制度、建設提供了清晰的圖像，對於宗教、風俗和生活上的一些細節，也作了許多獨到而意趣盎然的描繪：

法國城市間，街衢修整，道路坦潔，而都城尤甚。遇有碎石犖确，稍涉不平，則必命工匠修補。若其遺煤剩物狼藉途中，每街必專僱一二人司灑掃之役，以車載之而去。³⁹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開始瞭解到奇技淫巧的重要性，百科全書中也出現了《泰西藝學通考》之類的著作，對各種機器、日用事物的製作技術，作了大量圖文並茂的介紹。錢恂則以簡扼的文字，對法國人的工藝之精和利用專利、文憑等措施來獎掖有特殊才能的專門名家的作法，特別詳細陳述，他山之石的用意，不難體會：

法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別具手眼，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藝者，許專其利。或書籍，或醫藥，或工作，最先新創，許其專門名家能人，不能摹仿影射，妄希行世奪其利藪。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患致富之無具，馳名之乏術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國家給以文憑，方許行之久遠，其頒設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美利加皆行之矣。

法人心思精敏，工於製器。如一切新法機輪、槍砲、舟車，大半皆其所創。即織造之工，在歐洲中亦推精巧。所織大呢羽緞，皆縝密細緻，又能織花紋絲緞，式樣新異，層出不窮。此惟法人所獨擅，他國不能及也。

機器製造之局，大小不知凡幾，巴黎設有機器博物院，凡一切機器，俱有模式，分室陳列，俾資考究。⁴⁰

³⁸ 張之洞，〈保薦使才摺并清單〉，轉引自邱巍，《吳興錢氏家族研究》，頁36。

³⁹ 《五洲各國政治考》卷八，〈街道〉，頁10a。

⁴⁰ 同前卷，〈工政·工藝〉，頁11a。

對於日本和西方的男女、親子關係，也提出了和儒家男尊女卑、父慈子孝的理念極不同的視野：

（日本）男子自強之意，卻不如女子。女子能擔畚互市於市街，男子則與鄉黨朋友飲酒娛樂，食婦女之力，所在皆然也。⁴¹

泰西一夫祇能配一妻，即君主亦然。近來鰥夫始准續娶，從前尚無此例。惟姦情不禁，姦生之男，育嬰堂為之撫養，十四歲以前，由姦夫貼飯貲若干，否則姦婦可以控告。

泰西男婚女嫁皆自擇，其俗女蕩而男貞，女有所悅，輒問其有妻否，無則狎之，男不敢先也。如有所悅，則約男至家相款洽，常避人密語。相將出游，父母不禁。款洽既久，兩意投合，各告父母。

泰西人不重後嗣，積產數百萬，臨終盡捨以建義塾及養老、濟貧等院。措置既已，自謂歿世無憾。詢以祀事何人，則曰吾捨貲以成善舉，雖千百載，猶奉吾像於其地矣！奚以祀為？語以祖父血食之斬，則曰祖父養吾一人，吾以其財養千萬人，大孝即在是矣！⁴²

這樣的立論，和陳獨秀、胡適等人一九〇〇年代在白話報上宣揚的男女平權、無後主義、非孝論等激烈的言辭，在思想取向上已經類同，同樣可歸入新文化、新潮流的範疇。雖然我們不知道錢恂此書的讀者群為何，也無從推斷白話報中種種激烈言辭的根源，但可以合理的推測，西方人不同的女權和家庭觀，就像列強的政法制度一樣，對清末的知識分子，必定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就思想的系譜來說，錢恂此處的介紹，和晚清民初的相關言論，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前文所引錢恂各種關於政治、制度、風俗的記敘，我們不難發現《五洲各國政治考》全書其實有著一貫的精神和取向，不論是就形式或內容而言，這本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已經充分展現了現代的新風貌。

二・維新派

陳壽彭（1855-?）所翻譯的《中國江海險要圖誌》，由英國海軍海圖官局編製，根據鍾少華的描述：「原書是英國海軍對世界航行進行多年實測成的航行百

⁴¹ 《五洲各國政治考》卷三，〈禮政・日本・風俗〉，頁2a。

⁴² 同前卷，〈禮政・泰西・風俗〉，頁3b-4a。

科全書」，前後編纂的時間達五十年，修訂三次。⁴³ 內容雖較專門，但已有百科全書的精神和規模，所以被鍾歸入「專門百科全書型」。⁴⁴

陳壽彭的背景，和前文描述的馬建忠、錢恂有不少類似之處。他的哥哥陳季同 (1851-1907) 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及翻譯家，和馬建忠同船赴法。妻子薛紹徽則和錢恂的妻子單士厘一樣，同樣以清末女翻譯家的身分，在晚近的研究中受到特別的關注。陳季同和嚴復都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馬尾船政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陳壽彭在陳季同的引導下，也進入船政學堂。一八八三年四月，他到日本游學半年多。一八八六年被選入船政學堂第三批出洋學生，赴英留學三年。⁴⁵ 陳壽彭留學英國期間，曾在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兩年，專學水師海軍公法，這是他日後翻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的原因之一。

光緒三十三年 (1907)，陳出版《中國江海險要圖誌》一書時的官銜是「洋務委員候選知縣」。⁴⁶ 但從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陳壽彭自一八八九年回國之初的一段際遇，顯然無法和他的兄長陳季同及錢恂相比。書前的一篇序文，對陳壽彭最初如何受沈葆楨的提拔，進入馬尾船政學堂、出洋留學以至「海外歸來，落落無所遇」的過程，有如下的描述：

時侯官陳君繹如以少年聰雋，為文肅所識拔，命習英文，兼駕駛術。留堂者五年，上練船者二年，而學始成。君意不自慊，歸而博考中國圖籍，……久之，出遊歐洲，各大國都會足跡幾徧，耳濡目染，學識益進。願海外歸來，落落無所遇。雖成己丑科副貢，而長才蠖屈，卒不得有所藉手以自表現，為君惜，抑為國家慨。⁴⁷

⁴³ 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頁68。

⁴⁴ 同前書，頁68，題為《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原書內頁的書名也如此標示，不過內文和各卷均題為《中國江海險要圖誌》。

⁴⁵ 薛紹徽對陳壽彭赴英留學的年代分別有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兩種不同的記載；見林怡，〈簡論晚清著名閩籍女作家薛紹徽〉，《東南學報》2004.增刊：283, 285。但根據李長莉對洋務運動時期官派留學生所作的概述，船政學堂第三批二十四人赴歐的年代應為一八八六年；見《先覺者的悲劇——洋務知識分子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223，附錄三。林慶元對船政學堂出洋留學的學生和年代，做了更全面的考證；見《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增訂本，1999），頁204-207。

⁴⁶ 見書前所附陳壽彭願將此書版權送歸廣雅書局的奏摺；陳壽彭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廣東廣雅書局重印本）。

⁴⁷ 同前書，〈楊敏曾序〉，頁1a。

從序言中，我們知道陳於一八八九年回國後，曾試圖重回科舉正途，在當年舉為副貢，但始終無法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夫妻二人過著儉樸的生活。一八九七年，四十三歲的陳壽彭帶著妻子移居上海，展開一段和其他許多新式文人一樣，靠賣文譯書為生的日子。這年夏、秋之交，以婦女為主的維新派團體「女學會」在上海成立，譚嗣同和康廣仁的妻子都是倡辦董事，陳季同和梁啟超、汪康年等都參與其事，薛紹徽也應邀參與女學會創辦的《女學報》的編輯工作。⁴⁸

一八九七年，戊戌變法前一年，陳季同和陳壽彭在上海辦《求是報》，⁴⁹ 由陳的同鄉，支持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同光體」詩人陳衍為主筆，⁵⁰《求是報》是維新派的機關報《時務報》支持的眾多報刊之一。⁵¹ 我將陳壽彭歸入維新派，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就像我在文章開頭中所說的，這些百科全書家常常具有幾種不同的身分。以陳壽彭為例，既可算是留學生，在一九〇〇年後的經歷，又可歸入上層士紳之列。此處將他歸入維新派，不過是就他生涯中某一項較醒目的活動所做的區劃。

《求是報》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創刊，陳壽彭翻譯的《西學淵源考》，有一部分就刊載在《求是報》上。這份報刊停刊日期不詳，但顯然並未維持太久。⁵² 陳隨即於一八九八年進入寧波儲才學堂，任西文教習。《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就在這段時期譯出。一九〇二年，他考中舉人，開始游宦於上海、河南、南京等地。⁵³

⁴⁸ 林怡，〈簡論晚清著名閩籍女作家薛紹徽〉，頁283。錢南秀對薛紹徽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做過很詳細的研究。可參考她寫的兩篇文章；錢南秀，〈中典與西典：薛紹徽之駢文用事〉，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582-612；〈清季女作家薛紹徽及其《外國列女傳》〉，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932-956。薛紹徽雖然參與了女學會創辦的《女學報》的編輯工作，並對君主立憲制度持肯定態度，但對女學會所提倡的女權、女學、婦女參政、婚姻自由等思想都不表認同，對新的婦女觀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和憂慮；見林怡，〈簡論晚清著名閩籍女作家薛紹徽〉，頁283-284。

⁴⁹ 有關陳季同的生平和著述，以及《求是報》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岳峰，〈東學西漸第一人〉，頁54。

⁵⁰ 關於陳衍及他此時的政治立場，見林東源，〈陳衍的經濟思想解讀〉，《商業時代》2006.27：110。

⁵¹ 見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頁141-142。

⁵²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456-461。

⁵³ 林怡，〈簡論晚清著名閩籍女作家薛紹徽〉，頁283。

英國海軍海圖官局原來編纂的全書於一八九四年出版，分四大部，長數百萬言，陳壽彭取其第三部專門介紹中國海濱的部分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譯出。⁵⁴ 從一八九八年春天開始著手，到一八九九年冬天大抵告成，全稿抄繕完畢後，適逢義和團亂起，「津沽煙塵正急」，乃將書稿束之高閣。一九〇〇年冬天，陳壽彭辭去寧波儲才學堂的教職，攜稿至上海。⁵⁵ 全書先於一九〇一年由上海經世文社用石板印行二千部，包括正編二十二卷，續編五卷，圖五卷，共三十二卷。書成之後，風行海內外，「績學之士咸稱有用」。官方也讚譽備至。一九〇五年張謇就因為這本書的啟發，而奏請清廷繪製漁業界圖。外務部和商務部接到張謇的咨文後，「亦言是書精詳，嘉許備至」。⁵⁶

這套書初版兩千本，銷售一空。甲午戰敗後，清廷意欲整頓海軍，全書又有了新的時代意義和需求，已經擢升為候補知縣的陳壽彭也因此萌生捐書給廣東官書局的構想。在給兩廣總督周馥的奏摺中，陳對這段捐書的過程，有生動而細微的說明，為清末百科全書的發行、製作、銷售，提供了難得的記錄：

近聞廷議，將欲振頓海軍，然海軍之根本，在於圖誌。圖誌明，則險要熟，船礮始克得用。今壽彭所譯之圖誌，乃英人費五十年測量之力而成，尤為通宜之本。第當時初版，僅印二千部，久已售罄。既未許以版權，而經世文社亦已倒閉，故未續印，致各學堂及有志之士，欲求購是書，竟不可得。近又聞 大帥曾令提學司開設官書局。壽彭願將此書版權，送歸廣雅書局，聽憑刊印石板或木板行世，定價出售，以廣流傳。所得利益，壽彭皆不過問，惟印成時，倘蒙批賜若干部給與壽彭，以為分贈親友之需，足矣。⁵⁷

這套書雖然是譯作，但陳壽彭在格式和內容上都作了調整、補充。原書的編目，按層按節，為的就是方便讀者閱讀。陳在各分卷之首，又補編了細目，「使

⁵⁴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卷首，〈譯例〉，頁1。此書的原作是 Charles Henry Clarke Langdon ed.,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COMPRISING THE COASTS OF CHINA FROM HONG KONG TO THE KOREA; NORTH COAST OF LUZON, FORMOSA ISLAND AND STRAIT; THE BABUYAN, BASHEE, AND MELACO SIMA GROUPS. YELLOW SEA, GULFS OF PE-CHILI AND LIAU-TUNG. ALSO THE RIVERS CANTON, WEST, MIN, YUNG, YANGTZE, YELLOW, PEI HO, AND LIAU HO; AND PRATAS ISLAND* (London: Hydrographic Office, 1894-96, 3rd ed.)。我要特別謝謝華格納 (Rudolf Wagner) 教授告訴我這則資料。

⁵⁵ 同前書，〈譯例〉，頁3b。

⁵⁶ 同前書，〈序前說明〉，頁2a-b。

⁵⁷ 同前文，頁2b。

讀者易於稽查次第」，⁵⁸ 是極標準的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和精神。在內容方面，則添加了一些註解文字，並將原書的圖表，根據中譯本的規格，作了不少調整：「誌與圖，表裡爲用，今計是書應用之原圖約百軸，而大小不齊，難入卷帙。用酌選西圖之要者，手爲描繪，大者繪小者，拓精煩者，切割爲數圖，共成二百零八軸，釐爲五卷。」⁵⁹

交由官書局重印的版本，印製相當精良，字跡工整，字型較一般同類書大，間距也寬闊很多。在卷首的總目錄外，陳壽彭在每一卷前又增列了每卷的目錄，每個條目前，冠以小標題，單獨成行，和傳統類書相比，查索容易許多。每個條目約二、三百字，亦有短至數十字，長至一、二千字者，中有標點。更特別的是，每個條目的內容雖不分段落，但幾乎每隔一、二行或二、三行，就會有一空格，對上下文作出段落一般的區隔，方便讀者閱讀的用心非常明顯。陳季同在序文中，將本書放在《水經注》以降的輿地書的傳統中，對其性質和價值作了扼要的評估，認爲它承續了林則徐以來，採譯西國輿地書的長處，又免掉了魏源《海國圖志》或是錯誤百出，或是不得西人原書精要，或是缺乏圖誌的各種弊病。⁶⁰ 綜觀全書，雖有如霧號、潮流、方位、羅經差等專門的知識，但許多關於中國城市、口岸的描寫，混雜了西方人好奇、新鮮的視野和陳壽彭雅馴的中文，帶來一種新的閱讀經驗和愉悅感。下面這則陳壽彭加了幾處按語的「台灣島」，是一個例子：

台灣島 由南沙至龍頭角，皆台灣之東濱，俗稱之台灣後是也

台灣島。Formosa island 南北長二百十迷當，最闊處八十迷當。高山綿亘，所占甚廣，其中部舒於西岸，山勢暫低，入海為平原，乃中國之郡城，曰台灣府 Taiwan fu。其西北一帶，港口村落，久隸中國。而東濱土蕃，頑梗而好勇，叛服不常。中國但視寬大以撫之。

土風 往者外洋之船擱淺其處，水手等曾為土蕃殺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西曆十月十五日，由美國駐劄廈門之領事，與土蕃立約。約使台南濱海一帶得以安穩也。⁶¹

台灣東濱

⁵⁸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譯例〉，頁2b。

⁵⁹ 同前書，〈譯例〉，頁3a。

⁶⁰ 同前書，〈陳季同序〉，頁3a-b。

⁶¹ 同前書，卷一〇，頁12a。

台灣東濱，諸山綿亘，絡繹起伏，展至東北北，計長二百迷當，除蘇澳 Sans Bay 見下外，別無他港。言無可停泊之港，非然者。當春有埤南港。再之則花螺港，再之則埤廣澳，安得謂無哉？近岸處皆深水。諸山皆峭立於海山者。山旁有少許種植之區，所見村落則零星。⁶²

對濟南府的介紹，一方面有著傳統游記的風味，一方面又能在短短的篇幅下，對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商業活動作了肌理清晰的鳥瞰式綜覽：

濟南府

濟南府。Jsi nan fu 乃山東之省會也。立在河之南四迷當，距諸山之麓不遠。其近處之山，約高八百至一千二百尺，諸山遠近、好景如畫，叢樹開展處，一城屹然。其林木蔭蔚於河之兩岸，凡數迷當。樹木隱約中，見鄰近諸小山，或尖瘦如削筍，或稜突如犬牙，而堆疊者則岩石也，比比皆是。路口在濟陽之上，二十四迷當半，乃省會大埠也，在河南岸上，地勢長而散，乃無城郭之市鎮，濟南商埠皆聚此，亦一大要道焉。其運載首重兩輪車走陸路，是處亦見無數艇船，皆無大號者，蓋以經行於運河者尤眾。商貨惟鹽頗廣，皆由鐵門關溯河而上者。煤亦一宗之貨，有產本地者，有從黃河他邑而來者，第有天生之油質言係曲煤，每擔索價至一千二百文。⁶³

在陳壽彭完成全部譯文後，一度讓他將手稿束之高閣的津、沽煙塵，在英國人的勘測、記載中，因為事關重大，而格外詳實。在大沽的部分，由港口的軍事設施入手，以雞鴨牲畜、綿羊、蔬菜等後援物資收尾，可謂鉅細靡遺：

大沽

大沽。Taku 乃北河進口處，足以直達都城，是為武備要衝。其地勢低而平。新來之船，欲取以為誌，而進此口甚難。若灯船不在是處，則無可指之方向。再除其舉起之鐵炮台，凡船至此，更無驗準。砲台之前，有泥灘焉，變幻不測。其水之覆與否，亦不定，是處又有一小砲台，略偏於西南向。

電線 相連於砲台兩岸之間，凡船須提防，勿泊近於纜。

接濟 天津由沿河一帶，牛犢雞鴨皆有之，綿羊尤廉而盛，脂油特厚，菜蔬略少。⁶⁴

⁶²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卷一〇，頁14a。

⁶³ 同前書，卷二一，頁8b。

⁶⁴ 同前卷，頁15a-b。

大沽之後，緊接著就是天津，英國的調查員對這座城市的整體佈局、洋務設施，乃至流行疫病，同樣有簡扼而帶有異國風味的描述：

天津

天津。Tien tsin 乃商埠也，已詳於上，在運河北河匯合處。……狀四角，郭外向河之處，較城尤寬廣。其兩向沿河者，約長二迷當，是為商務薈萃之區。霍亂痞瘡、痘症等，每年死者甚夥。據云天津水中之消息，足與上海、廣東等也。外國領界，約在其城之下節二迷當處。英國者曰紫竹林 Tz chu lin 在河之南岸，中設有領事官，外有碼頭，以便輪船起卸諸貨。英租界之下，四分迷當之一，乃關道衙署，是處亦有圓式女牆，並深溝等，謂之三角林 Sang ko lin 未詳，其內有外洋房居、海關、小禮拜堂、賽馬場、墳地等。亦有一神廟，即一千八百五十年和約署押處。中國政府於天津設軍械廠二，皆外洋人課之，一在於河之左岸，乃製火葯及砲彈銅殼等，其一則為魚雷書院，有英國電學家一人董其事，生徒十四人，恒為訓練。此中有電報德律風，通於天津總督衙署，以生徒司之。⁶⁵

接下來，編者以約三百字的篇幅介紹了天津在一八九二年的進出口數額、進口商船的數量（全年共六百四十九艘），綿布、綢緞、鴉片等進口的洋貨和各種從上海轉運來的土貨。⁶⁶ 並對天津的天氣與郵政，提供了非常實用的資訊：「天津陸路之驛遞，每拜二、拜四、拜六，午刻即發一次，由鎮江行。若無大風雪所阻，則直達上海，計須十六日之程。亦有通於牛莊者。其至北京者，每一日一次。」⁶⁷

從上面這些不厭其詳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使在這部以軍事、國防為主要目的的鉅幅作品中，也充滿了各種觀察城市、港埠乃至日常生活的新鮮視野。在略去某些過於專門的條目後，全書的記述簡扼、淺顯，既提供了有趣的細節，又能同時勾勒出每座城市、島嶼、港灣的整體面貌。雖然描寫的對象是中國而非錢恂所介紹的日本、歐洲等地，但卻同樣能為中國讀者帶來新鮮的視野，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符合百科全書的編寫精神。

⁶⁵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卷二一，頁15b-16a。

⁶⁶ 同前卷，頁16a。

⁶⁷ 同前卷，頁16b。

三・留日學生

一九〇三（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的《新爾雅》一書，只有一百七十六頁，在規模上完全無法和馬建忠、錢恂、陳壽彭的作品相類比。但在內容和形式上，卻已具備百科全書的架勢，鍾少華將之和《博物大辭典》、《普通百科大辭典》及《外國地名人辭典》等著作並列，歸入「百科辭典型」。

《新爾雅》的編纂者共有兩位：汪榮寶和葉瀾。關於葉瀾，目前還沒有看到有系統的研究，我爰就資料所及，拼貼出一個大概的輪廓。一八七五年出生的葉瀾，和錢恂的女婿董鴻禕，同樣是浙江仁和人，曾和兄長葉瀚一起赴上海格致書院就讀。一八七六年開院的格致書院，是培育中國近代新式知識分子的重鎮，對西方科學知識的普及，也有極大的貢獻。⁶⁸ 在一八八六到九四年王韜掌院期間，格致書院周圍聚集了三百名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或者肄業于格致書院，廣方言館，或是初有功名，大多數則是府州縣學的生員」。⁶⁹ 葉瀚是仁和縣學的增貢生，葉瀾則是杭州府學的附貢生，⁷⁰ 都是轉型期的地方菁英。兄弟二人都是學院中表現優異的學生。書院每年春秋二次考課的命題、評閱由海關諸道、南北洋大臣承擔。在這個近似西方人“Essay Contest”的論文競賽中，葉瀚分別在一八九二和九三年名列優勝者之列，評閱人都是李鴻章。⁷¹

葉瀚、葉瀾兄弟從格致書院畢業後，一度積極參與戊戌變法運動。就在陳季同、陳壽彭兄弟創辦《求是報》的同時，葉瀚、葉瀾也在同一年（1897）十月二十六日，同樣以兄弟檔的形式，在上海創辦了另一份維新派的期刊——《蒙學報》——由汪康年任總董，葉瀚為總撰述，葉瀾為撰述兼刪校。這份《蒙學報》由蒙學公會發行。蒙學公會由葉瀚、汪康年等人設立，宗旨在辦書報、立學堂，⁷² 充分反映了一八九五年之後，知識分子立學會、設學堂、辦報紙的時代潮流。

⁶⁸ 參見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3-8；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⁶⁹ 劉世龍，〈清末上海格致書院與早期的改良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4：46。

⁷⁰ 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附錄三，〈上海格致書院特課與季課歷年優獎課生名表〉，頁291。

⁷¹ 同前書，頁34-35, 297, 299。

⁷²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頁472-474。

一九〇一年，葉瀾到日本留學，⁷³ 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立場也日趨激烈，成爲一個十足的革命黨人。根據馮自由的記載，我們可以將葉瀾留日期間的活動作一個簡單的摘要：一九〇二年冬天，和董鴻禕、汪榮寶、張繼及積極參與革命黨活動的秦毓鎣等人，一起在東京成立「青年會」。發起人中除了上述諸人外，還包括我們較熟悉的蔣百里、蘇曼殊、馮自由等共十餘人。這個日本留學界中最早的革命團體，成員多半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⁷⁴ 葉瀾會和汪榮寶在一九〇三年合編《新爾雅》一書，顯然和同爲早稻田大學學生及革命黨員有關。

一九〇三年春天，俄國進兵東三省，掀起了留日學生的民族主義熱潮。鈕永建欲發起拒俄義勇隊，爲留學生會館的幹事章宗祥、曹汝霖拒絕。葉瀾聞訊，乃向秦毓鎣等人游說附和鈕的主張，隨即遍發傳單，在神田錦輝館召集了五百多名各省的留學生舉行大會。鈕永建和葉瀾等人在會中慷慨陳辭，拒俄義勇隊乃告成立。葉瀾同時擔任會議主席。⁷⁵

同年夏天，拒俄義勇隊被迫解散後，葉瀾又和董鴻禕、秦毓鎣等人發起軍國民教育會，從拒俄禦侮轉爲革命排滿。⁷⁶ 軍國民教育會是一個人數不多，但組織嚴密的祕密團體。組成後不久，陳天華等人被派回國作運動員，運動各省的排滿運動，董鴻禕則赴南洋群島活動。⁷⁷ 一九〇三年夏天，孫中山造訪橫濱，各省留學志士紛紛前往拜謁，葉瀾和董鴻禕都在名單之列。⁷⁸ 同年五月，《蘇報》案發生，爲了宣傳需要，章士釗等人於十月在上海另外創立《國民日日報》，風行一時，被稱爲《蘇報》第二。不久，報社內部發生爭執，訴諸公堂。已經返回上海的葉瀾一度介入，奔走協調。⁷⁹ 從一九〇一年赴日，到〇三年返回上海，二年之內，年不滿三十的葉瀾已經從一位維新志士，變成積極獻身革命的熱血青年。

我在這裡將葉瀾歸入留學生之列，而非革命黨項下，有下面幾點考慮：（一）葉瀾除了獻身革命外，還一度是立憲派報刊的創辦人。（二）和葉瀾一起編纂《新爾雅》的汪榮寶，回國後積極參與立憲運動，被視爲立憲派的代表人物。早稻田大學留學生的身分，乃成爲兩人共同具有的特點。（三）《新爾雅》

⁷³ 劉世龍，〈清末上海格致書院與早期的改良思想〉，頁52。

⁷⁴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3），頁102。

⁷⁵ 同前書，頁104, 125。馮在此處有不同記載，說與會留學生逾千人。

⁷⁶ 同前書，頁109。

⁷⁷ 同前書，頁112, 124-125。

⁷⁸ 同前書，頁132-133。

⁷⁹ 同前書，頁135-136。

一書雖然是一九〇三年由革命黨在上海的機關團體國學社發行，⁸⁰ 但卻是兩人在日本撰寫，並在東京淺草的「東京並木活版所」印刷。⁸¹ 和日本的關係極為密切，也反映了百科全書編纂者及知識來源的另一個趨向。

汪榮寶 (1878-1933)，江蘇吳縣人，比葉瀾小兩歲，同樣在一九〇一年赴日本。先後在東京政法速成學校、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校學習政治、法律和史學。返國後任京師譯學館教員，一九〇八年起在民政部擔任數種職位，並在修訂法律館和憲政編查館兼職。一九一〇年任資政院勅選議員。一九一一年任協纂憲法大臣，還被指派為《法令全書》的總纂。他在宣統年間的北京政壇非常活躍，⁸² 積極鼓吹立憲政治，是清政府欽定憲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也是立憲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民國初年任臨時參政院議員、國會眾議員。一九一五年為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委員，後出任駐瑞士公使。一九二二至三一年擔任中國駐日本公使。⁸³

比錢恂晚了將近一個世代的汪榮寶，雖然也在人生的後半期攀登上仕途的高峰，出任先進大國的使節，而可歸入外交官和上層士紳的範疇。但在二十三、四歲時，出國讀書，並參與激進的留學生組織。和許多二十世紀初的年輕知識分子一樣，在教育、生涯模式上，已經具備現代的風貌。

《新爾雅》一書篇幅短小，但內容卻涵蓋了法政和科學的主要類別。全書以活字在日本印刷，雖然可能囿於經費，編排簡樸，但已經和錢恂、陳壽彭以傳統線裝書裝幀的形式迥然不同，而近於今日的書籍排印方式。書前目錄欄中未列章

⁸⁰ 根據馮自由的記載，一九〇三年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後，推舉同志返國分省起義。七月在上海成立的國學社，就是在革命黨人回國分途活動的策略下出現，既編譯革命書籍，又兼為革命同志的運動機關；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125。

⁸¹ 見《新爾雅》（東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實藤文庫藏一九〇三年原刊本）一書後的版權頁。根據這個藏本，此書由東京淺草的「東京並木活版所」印刷，於上海明權社發賣。詳細的討論，見沈國威，《『新爾雅』とその語彙：研究・索引・影印本付》（東京：白帝社，1995），頁1。我這裡用的是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收錄的複製本。汪榮寶、葉瀾，《新爾雅》（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四十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第434種）。但此複製本並無相關的印刷、發行資料。

⁸² 北京大學圖書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汪榮寶日記》就詳細記載了宣統元年（1909）至三年（1911）的時局、事件和顯要人物；汪榮寶，《汪榮寶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叢書由天津古籍出版社發行，1987）。參見日記前的內容提要。

⁸³ 本節資料取自王曉秋，〈清末政壇變化的寫照——宣統年間《汪榮寶日記》剖析〉，《歷史研究》1989.1：73。汪榮寶在日本攻讀的學校，則見沈國威，《『新爾雅』とその語彙》，頁4。

節，但簡單的排列出全書的主要內容，分別是：「釋政、釋法、釋計、釋教育、釋群、釋名、釋幾何、釋天、釋地、釋格致、釋化、釋生理、釋動物、釋植物」等十四類。〈釋政〉項下分三篇，分別是〈釋國家〉、〈釋政體〉、〈釋機關〉。每篇之下又分若干條目。如〈釋政體〉下分為「德意志之立憲君主政體」、「英吉利之立憲民主政體」、「日本之立憲君主政體」、「法蘭西之立憲民主政體」等條目。每個條目約二、三百字，雖然簡略，卻能充分掌握到各國政體的特色：

英吉利者，為世襲君主統治之國，然實則民政發達最早，所謂立憲制度者，各國無不取法於英國。故英國政治之特色，在眾議院有最高至強之權力。

日本乃純然之君主國體也。其主權由天皇總攬，惟既立憲法開國會，與君主專制不同。

北美合眾國者，為民主最完全之國也。其國家組織，自一七八七年制定聯邦憲法始。當獨立戰爭時，北美各洲，已有由殖民地改為合眾國之機。

法蘭西者，現今為共和政體。溯十八世紀初，時為君主國，時為民主國。革命屢起，政體亦隨之屢變。現今法國之憲法，乃一八七五年國會所承認者也。然其共和制度，與美國不同。蓋美國之主權，在一般人民，法國則集於代表多數人民之議會。⁸⁴

汪榮寶和葉瀾編纂此書時如何分工合作，我們無從得知。但沈國威從二人留學前和留學時期的教育、專業背景，推測汪榮寶可能負責政治、法律，葉瀾則負責地理、天文部分。這個推斷有相當的根據。汪榮寶在留日期間，曾參與《譯學彙編》一書的編纂，在其中分別編譯了〈論理學〉、〈史學概論〉、〈歐洲歷史之新人種〉等文章。葉瀾則於留日前後編寫過《天文地學歌略》，作為新式小學校的教科書。⁸⁵《新爾雅》在編纂的過程中，極可能參考了當時東京可以找到的

⁸⁴ 《新爾雅》(1977)，頁10-11。

⁸⁵ 沈國威寫為《天文地理歌略》，見《『新爾雅』とその語彙》，頁4-7。不過根據省城學院前寶經堂藏版，葉瀾原書的名稱應為《天文地學歌略》，分為〈天文歌略〉、〈地學歌略〉兩個部分。二者都以四字韻言編成，類似《三字經》的格式。葉瀾在〈凡例〉中說：「是歌編寫，四字一句，以便童蒙，易於上口。間有繁瑣之理，不能編歌，即就各句下小注詳述，庶讀者更易明白。」〈天文歌略〉較短，只有一千多字，〈地學歌略〉則有四千餘字。兩者前分別附了天文圖和地球圖，包括了「八星繞日」「地球繞日成四季」「日月掩蝕」等圖和頗為詳備的東半球、西半球地圖；葉瀾，《天文地學歌略》

百科全書、教科書、辭典等論著。即便如此，以兩人二十多歲的年紀，能在簡短的篇幅中，抓住課題的核心，確實反映出二人的識見和訓練。一八九六年之後，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日本，此後藉由翻譯書籍等途徑引進的西方知識，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建構其生活世界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的重要來源。⁸⁶ 汪榮寶和葉瀾的案例，為這個大的知識圖像，做了具體的註腳。

四・新型文人

如果我們以科學考試作為衡量的標準，會發現大多數的百科全書作者其實都只具備初階的秀才身分。馬建忠、錢恂如此，曾經大量翻譯日本近代醫書，全面有系統地引進日式西醫知識與體系的丁福保（1874-1952）也是如此。⁸⁷ 但錢恂得意仕途，馬建忠受過完整的西方教育，回國後也頗能施展所長；丁福保則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在上海行醫達二十三年之久，其後並出任次子所創建的虹橋療養院的董事長等職位，是一位以專業名家的現代專業人士，⁸⁸ 在他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出第文人的色彩。相形之下，主編《百科新大辭典》的黃人（1866-1913），⁸⁹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間廣州寶經堂藏版）。細讀全文，可視為葉瀾前此在格致書院所學西方天文、地理知識的綜結。

⁸⁶ 參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181-194。

⁸⁷ 丁福保是江蘇無錫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十三歲時，成為無錫縣學的生員。一九〇〇年刊行的西醫通俗讀物《衛生學問答》，以簡單的問答方式，有系統的介紹醫學、衛生知識，用本文的標準來看，已可歸入百科全書的範疇；丁福保，《衛生學問答》（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文明書局印行本）。這本書在東京印刷，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光緒二十六年發行第一版，六年之內，增訂了十一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我用的是上海圖書館的藏本，當時是作為「普通教科問答叢書」的一種發行。一九〇一年，丁福保進入盛宣懷在上海虹口創設的東文學堂，學習日語及醫學。一九〇九年應兩江總督端方及盛宣懷之命，赴日本考察醫學及醫療機構，對日本醫學改革的成果、日本醫學與醫療技術的發展，有了一手而深刻的瞭解。翻譯、出版日文西醫書成為他豐富的人生事業中的一個主要面向，先後翻譯或編譯的醫書近百種；參見牛亞華、馮立昇，〈丁福保與近代中日醫學交流〉，《中國科技史料》25.4（2004）：315-329；高毓秋，〈丁福保年表〉，《中華醫史雜誌》33.3（2003）：184-188。鍾少華將丁福保譯自恩田重信的《新萬國藥方》歸為「專門百科全書型」；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頁71。

⁸⁸ 參見高毓秋，〈丁福保年表〉。

⁸⁹ 黃人，字摩西，江蘇常熟人。相關的研究，可參考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

主編《博物大辭典》的徐念慈，⁹⁰和編纂《萬國近政考略》的鄒弢更切近我們對這類新型文人的想像。李仁淵對包天笑所代表的這批新時代的江南士人的生涯模式，作了精要的勾勒：

1900-1906年間，包天笑從蘇州到南京，從南京到上海，從上海到青州，最後回到上海定居，一路上從事的都是與傳播「新學」相關的工作：到新學堂教書、辦報紙期刊、翻譯日文書、組學會聽演講、寫小說投稿、在報社任記者編輯。然而不過在十多年前，包天笑還在科場奮鬥，五歲入私塾，1890年落榜，1893年十八歲時考上秀才。……但是在短短數年間，包天笑卻全然轉向新學，儼然成為地方上的新學領袖；反而是他在科舉上表現傑出的母家親戚，日後都沒有特別的表現，抑鬱而終。

從一個蘇州的窮士子，到上海著名的小說家、報刊編輯與教育家，後來更被追溯為鴛鴦蝴蝶派的創始者之一，包天笑這幾年的經歷可說是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⁹¹

就生涯模式而言，鄒弢和包天笑所代表的這一批新型文人或江南士人，可以劃入同一個範疇。但從出生的年代來看，鄒弢比這群一八六〇至七〇年代出生的晚清士人更為年長，和一八四五年出生的馬建忠及一八五四年出生的錢恂反倒屬於同一年齡層。但換一個角度看，鄒弢雖然因為編纂《萬國近政考略》而受到薛福成的賞識，似乎可以和馬、錢一樣，躋身西學家之列，但他的西學知識，卻沒有為他在功名仕進、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上帶來實質的助益。更有意思的是，在

的文學》，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155-192；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頁135-154。

⁹⁰ 徐念慈，江蘇常熟人，一八七五年生，雖然鄙視帖括之學，仍於一八九五年中秀才。一九〇三年，徐念慈和丁祖蔭等設立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一方面體現了他在地方熱心推動新式教育的努力，一方面則因為他在同一年加入同盟會，想用此名目來掩護革命活動。一九〇六年，為了和商務印書館競爭教科書的市場，徐念慈建議小說林社擴充事務，出版教科書，並增設宏文館，編輯印行辭典、地圖。一九〇七年，《博物大辭典》一書問世，除了徐念慈本人外，編輯群中還包括了同樣是秀才出身的新型文人包天笑。參見時萌著，《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中所附的〈徐念慈年譜〉，及《博物大辭典》一書的例言；時萌，《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247, 248, 252, 257；徐念慈，《博物大辭典》（上海：宏文館，1907）。包天笑晚年寫的回憶錄中，也簡略地提到小說林社和宏文館編輯《博物大辭典》一事，但從他的語氣中，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否真的參與了此書的編輯；見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第48種），頁323-327。

⁹¹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頁342-344。

他的傳世作品和近代學界的研究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落魄潦倒的艷情小說和駢體詩文作者的舊式文人形象。鄒弢一方面出生得早，和馬建忠、錢恂同屬一個時代；一方面又活得夠久，不幸目睹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國粹消沈，不學少年方迷信語體，……令人欲嘔而學界偏奉為程式潮流」⁹²的群魔亂舞的現象，讓鄒弢的舊式文人形象更形突出。鄒弢死後由友人集資出版的駢儷文集《三借廬集》，雖然讓鄒弢作為反動、守舊文人的那一個面向格外刺眼，但如果將他放在清末的時代脈絡下來考量，不但《萬國近政考略》充滿了「進步」的新氣息，即使他的自傳小說《海上塵天影》，也在舊的情節框架和敘事結構下，處處呈現著出人意表的時代性情節。部分敘事甚至可以看成是《萬國近政考略》的補編，可以當成百科全書的條目來閱讀。

關於鄒弢的生平，中國大陸的學者已經作了一些基本的考訂，我這裡根據這些資料和《三借廬集》中的記載勾勒如下。鄒弢是江蘇無錫人，生於道光三十年（1850），卒於一九三一年。號瀟湘館侍者、瘦鶴詞人、司香舊尉。生平嗜酒，又自號酒丐，充分反映出舊式文人的性格。同治五年（1866）隨父親遷居蘇州。光緒元年（1875）考上秀才，此後十試秋闈皆不中。光緒六年至上海，任申報館記者、主筆，在這裡結識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報人作家，⁹³並投身王韜門下（見下文），大大拓展了他的西學視野。十四年，應山東巡撫之請，在淄川礦山供職。十八年與風塵女子汪瑗相交，詩詞唱和，恩愛非常。光緒二十年（1894）赴湖南為幕，開始寫作《海上塵天影》。二十一年，鄒弢返回上海，汪瑗已經從良。從《三借廬集》中的詩文，我們知道鄒返回上海後不久，就在徐家匯置屋住居。⁹⁴二十六年成為天主教徒。三十一年（1905）開始在啓明女塾任教職。⁹⁵

⁹² 見吳蔭培為《三借廬集》所寫的序，收入鄒弢，《三借廬集》（常熟：開文社印刷所，1932），頁5。

⁹³ 鄒弢於光緒六年（1880）到上海，先後擔任《申報》的記者、主筆，和黃式權、葛其龍、秦雨等人是氣味相投的朋友。王韜回到上海後，很快就成為這群《申報》報人作家的領袖，和鄒弢、何桂笙、錢昕伯等文人名士詩酒往返；見王學鈞，〈鄒弢《海上塵天影》的中西比較意識〉，《明清小說研究》2004.2：136。

⁹⁴ 《三借廬集》，〈六十放言〉，頁107b。

⁹⁵ 參見蕭相愷，〈鄒弢〉，氏編，《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頁830；以及黃毅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海上塵天影》所寫的前言；鄒弢，《海上塵天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1904〕石印本影印）。

鄒弢在啓明女塾任職十七年，所從事的工作包括編教科書、速成文訣、尺牘課選和課本菁萃，頗能切乎一九〇〇年代和一九一〇年代的時代需求，也反映了他作為新式文人的一面。但就和徐念慈等人創辦的宏文館一樣，這些維新、啓蒙的事業不但不能帶來穩定的收入，反而常常讓投入這個新興市場的文人、知識分子傾家蕩產，失敗以終。宏文館如此，金粟齋如此，葉瀚的啓智書局⁹⁶和啓明女塾亦復如此。根據鄒弢自己的描述，他在啓明編纂的教科書、課本，基本上是義務性質，六年內焚膏繼晷，耗盡精神，增進了學校的聲譽，最後卻被學校棄如敝屣。鄒因而破產，一九二三年被迫返回無錫故里，出任圖書館的館長。⁹⁷鄒弢破產後返回故里，生活頓成問題，他過去在啓明女學的學生，幾次發起募款活動，作為養老津貼。⁹⁸鄒弢在八十歲和八十一歲時寫的詩文中，都曾感慨系之的提起此事：「特為銷愁沽酒去，最難養老送錢來」、⁹⁹「八一衰年未倒翁，讓鄉僻處守孤窮，平生已悔虛名立，到死還虧實惠通」。¹⁰⁰

鄒弢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際，對自己一生徒具虛名，卻不能轉換成實惠的感嘆，對一位從年輕時代就致力於經濟有用之學的讀書人來說，當然不無一絲反諷的意味。相對於本文中提到的多數百科全書的作者來說，鄒弢畢生為貧窮所困的窘境似乎格外凸顯，孫乃德和薛福成為《萬國近政考略》寫的序文中，更讓我們體會到講求時務的虛名無法轉換為社會地位和經濟資源的悲哀。鄒弢晚年放棄洋務，轉回到舊式文人「徒務虛文」的老路子上，和經世之學無法帶來任何個人的實質利益應該有極大的關係。孫乃德在光緒二十一年冬寫的序文，放在這樣的角度下來檢視，讓我們看到一個發憤苦讀新學，經濟情況卻未因之改善的有志之士立志讀書、出版的過程。

孫乃德首先感慨從道光末年以來，風氣雖然日漸開通，朝野士大夫也都以講求洋務為尚，但幾十年下來，卻功效不彰。究其原因，和士大夫考求不精，徒務虛文顯然有極大的關係：「每歲考求洋務，而各國之山川地理、兵刑、風教，仍多未嫻。豈稽考之未精歟？抑亦虛文之無當也？」相形之下，鄒弢卻是廢寢忘食，全力投入洋務之學的編纂工作：

⁹⁶ 見《釧影樓回憶錄》，頁237-247。

⁹⁷ 《三借廬集》，頁100a, 101a, 116b。

⁹⁸ 同前書，頁121a, 123b-124a。

⁹⁹ 同前書，頁123b。

¹⁰⁰ 同前書，頁120b-121a。

譜兄鄒子翰飛，束髮讀書，不屑帖括章句之學，而於經濟有用之書，切切參求，日手一編，竟忘寢饋。庚寅冬，有某大員重帑招致。時翰飛方閉戶著書，辭而弗就。越二年，輯成《洋務新書》四十二卷，中有十六卷名曰《萬國近政考略》。余力勸付梓，以心力相違，不克如願。今翰飛自湘中回，因請之於黃愛棠大令、浦鑑庭上舍，集貲附益之，始得付之鉛印。此書一出，吾知士林中之喜論時務者，靡不爭先快觀。豈但有益時務而已哉！¹⁰¹

文中的「庚寅冬，有某大員重帑招致」，指的就是另一位為本書寫序的薛福成。光緒十六年，薛福成奉朝廷命令，擔任出使英、法、義、比大臣，在上海等船，對攜書求見的鄒弢頗為賞識，勸他一起出洋。鄒弢以親老不能遠遊婉拒了薛福成的好意。薛福成的序文中對鄒弢的清寒孤傲和困窘的遭遇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書中考據的確切，也頗為嘉許：

同鄉鄒翰飛茂才，王紫詮先生高足弟子也。年少蜚英，喜習經濟，常抱劉子元疑古之癖，懷王景略治國之才。顧起身蓬茅，有相如壁立之貧，無元禮登龍之引，而又意氣睥睨，以求人苟就為羞。於是起滅風塵，閉門著作。將平日所得於中西人士者成書十六卷，曰《萬國近政考略》，皆徵之近聞，與耳食無憑者相去霄壤。……因囑將書速付手民，以裨當世。按茂才於洋務頗有門徑。惜處境多困，遭際艱難，今得是書以顯之。坐而言者，何異起而行，請以余言，為後日之左券可乎？

薛序中的王紫詮即王韜，王韜在為《海上塵天影》寫的序中，一開頭也說本書是「門下士梁溪鄒生」所作。¹⁰² 鄒弢這個在傳統氛圍和制度下成長的不第文

¹⁰¹ 鄒弢，《萬國近政考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借廬校印本），〈孫乃德敘〉。

¹⁰² 王韜，〈海上塵天影序〉，鄒弢，《海上塵天影》（收入《晚清豔情小說叢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上冊。王韜在光緒十年（1884），在丁日昌、馬建忠、盛宣懷等人的奔走斡旋下，得到李鴻章的默許，全家人得以由香港返回上海；見王學鈞，〈王韜〉，蕭相愷主編，《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頁813。但在此之前，在一八八二年他便曾回上海探路。鄒弢就在這個時候登門探訪：「甫里王紫詮廣文韜，又字仲弢，才大學博。……壬午（按即光緒八年，1882）春歸自香海，往訪之，一見如舊相識。」見鄒弢，《三借廬筆談》（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出版年不詳〕，第七輯，第4冊），卷一〇，〈天南遯叟〉，頁13b-14a。王隨即於一八八五年受聘為格致書院院長；見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頁

人，靠著一腔孤憤，自己的刻苦求索，而能得到洋務大臣的賞識，可見本書用力之深。薛福成也顯然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為作者「處境多困」「遭際艱難」的生活乃至日後的生涯發展帶來助益。但衡諸鄒弢的後半生，這本中年出版的洋務專書，顯然沒有為他提供正途之外的另一種晉身之階。

不論是薛福成對本書「相去霄壤」的評價，或孫乃德「此書一出，吾知士林中之喜論時務者，靡不爭先快靚」的預言，都充分反映在日後的出版記錄中。鄒弢持書在上海請見薛福成是光緒十六年（1890），孫乃德的序文作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可見書成之後，到獲得資助出版，中間隔了好幾年。上海圖書館收藏了本書的三個版本，分別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明道堂版，二十七年（1901）三借廬本，及二十八年（1902）上海書局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光緒二十一年的版本，出版地不詳，封面題為《泰西各國新政考》，內頁題為《萬國近政考略》，內容則完全相同。這些不同的版本加在一起，讓我們可以推測此書在市場上顯然有不錯的需求，才会有不同的出版者年復一年的刊行。

《萬國近政考略》的出版，是在鄒弢赴湖南短暫游幕，重返上海定居之後。《海上塵天影》一書的刪定完稿，也正在這一段時期。《海上塵天影》中之所以會出現大量有關時務的敘事——即王韜在序言所說「大旨專事言情，離合悲歡，具有宛轉綢繆之致，……且于時事一門，議論確切，如象緯、輿圖、格致、韜略、算學、醫術、制造工作以及西國語言，無乎不備」¹⁰³——實和鄒弢此前長期關注，投入洋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王韜在序言的結尾中將此書的寫作和鄒弢的經世實學放在同一個大的脈絡下來考量，一方面可以說是一種夫子自道，有著強烈的自我投射和自我辯解的意味，一方面卻可以視為鄒弢半生著作和志業的最佳詮釋者：

余嘗觀此書，頗有經世實學寓乎其中，若以之問世，殊足善風俗而導顯蒙，徒以說部視之，亦淺之乎測生矣。生近日所著，如《萬國近政考略》、《洋務罪言》等，皆有用之書，原非徒嘔出心肝，為緣情綺靡之作者。¹⁰⁴

5。鄒弢顯然不是王在格致書院的學生，而應該是一八八二年回上海，受美查邀請參與《申報》時的學生；見王學鈞，〈鄒弢《海上塵天影》的中西比較意識〉，頁136。

¹⁰³ 王韜，〈海上塵天影序〉，《海上塵天影》（1993），頁2。

¹⁰⁴ 同前文，頁3。

事實上，如果撇開文學分析的角度，而從前此二十年間，鄒弢致力研讀、蒐集時務的脈絡來看，我們甚至可以將《海上塵天影》中的許多段落，視為《萬國近政考略》的補編來閱讀。

相較於當時許多長篇鉅製的同類作品，四卷本，一百五十幾頁（一頁雙面）的《萬國近政考略》，實不算宏大之作。但敘事精審簡扼，且出版年代較絕大多數同類型的著作早，難怪會受到薛福成的讚許和市場的接受。在〈凡例〉中，鄒弢自謂「是書之成，已二十年」，¹⁰⁵ 如果我們完全相信他在此處的說法，則此書的成書年代應在光緒初年，編輯的年代也可能從同治末年即開始。比馬建忠編纂《藝學統纂》，和錢恂在一八九〇年代隨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國時，開始蒐集《五洲各國政治考》的資料都要早很多年。這個時候，鄒弢還沒有來到上海，也沒有與《申報》的報人作家群結識，但出於對「經濟有用之學」的講求，開始著手撰寫這本領先時代的新式洋務著作。

更大的一個可能是鄒弢在進入上海申報館供職後，隨著交游圈的擴大和王韜的影響，在既有的基礎上，不斷的對舊著進行修改。照他自己的說法，本書的資料主要取自下列三個管道：或得自師承；或采取教士之說；或從翻譯之後，得其緒餘，集腋成裘，累積成書。這個師承，指的顯然就是王韜。而根據學者的研究，在這段時間，鄒弢和西方來華人士有廣泛的交往，並在光緒十五年（1889）加入了由美國傳教士卜舫濟（Pott. Francis Lister Hawks）所發起，旨在傳播西方科學的「益智會」。¹⁰⁶ 所謂「采取教士之說」，究係何指，雖然目前還不能完全確定，但極有可能就是這批西方來華之士和傳教士卜舫濟。

除了文字外，鄒弢原來也製作了一本地圖集，「詳誌道里」，但光緒十七年（1891）往南京鄉試時，這本放在行囊中的地圖輯，在下關輪船上被小偷偷走。所以鄒弢特別建議讀者在閱讀本書的文字描述時，另外購買泰西新圖一類的著作，與本書互為印證。¹⁰⁷ 鄒弢對地圖和圖像的重視，在《萬國近政考略》中雖然無法顯現，在《海上塵天影》中倒是牛刀小試了一番。書中第十五、十六章，敘述主角秋鶴陪著一位家財萬貫的廣東大學生到歐洲各國游歷，作者藉著秋鶴之口，

¹⁰⁵ 《萬國近政考略》，〈凡例〉。我用的是上海圖書館一九〇一年，三借廬的藏本。不過近史所一八九五年版的凡例和內容與一九〇一年版相同。

¹⁰⁶ 見王學鈞，〈鄒弢《海上塵天影》的中西比較意識〉，頁136。

¹⁰⁷ 同前註。

長篇累牘的敘述歐洲各地砲臺的分佈和裝置。爲了對比中國官員對西方科技的無知，秋鶴從彈道原理談到克虜伯砲的射程，又爲了方便隨行官員、聽眾的理解，還當場畫了三幅拋物線和射程遠近計算圖。¹⁰⁸ 雖然只有三幅圖，但其立意和精神，卻和我們在《泰西藝學通考》¹⁰⁹ 等一九〇〇年代流行的百科全書相彷彿。

也許因爲和上海的西方人有頻繁的接觸，再加上和王韜的師生關係，以及與傳教士的交往，讓鄒弢對《萬國近政考略》書中譯名的正確性，有著出人意料的信心：「書中人名、地名，係照西士口音譯出，且或英或法，又各不同，閱者須當意會。」另一方面，他雖然自稱「境地清寒，知識淺陋，管窺所及，安能進於高深」，但對自己超越其他侈談洋務者的考證功力，卻頗爲自得：「余入世以來，每喜考論時務，……惟近來談洋務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是書但尚考證，不尚論斷。」¹¹⁰ 這種精於考證的特長，不但被薛福成所鑑可：「余見書中考據確切，讀而嘉之。」也讓鄒弢覺得自己既超越了時人，也超越了前賢：「《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兩書所載甚詳，惟當時風氣初開，洋務未悉，故偶有虛誕失實之處，茲書悉從西書譯出，諒無是病。」¹¹¹ 不過相較於前文中提到的陳季同對魏源的指責：「魏默深廣之爲《海國圖志》，其間繁略謬誤之處姑無論，惟皆指摘他人疵瑕，不知自己疤痕，明燭千里，不見眉睫，又安足用哉？」¹¹² 鄒弢這裡的評論可說是點到爲止，而且語多體諒。

作爲中國近代第一波認識世界的系統性論著，《海國圖志》的時代意義和它對一八五〇年之後中國乃至日本知識界的影響，歷來都有所論述，¹¹³ 但也不斷

¹⁰⁸ 《海上塵天影》(1993)，頁233-234。下文中的引文，用的都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版本。

¹⁰⁹ 《泰西藝學通考》的性質和馬建忠的《藝學統纂》類似，以介紹西方的聲、光、化、電、天文學、力學、汽學等科技知識為主體。印刷較《藝學統纂》精良，最大的特色是全書有大量的插圖，有時一頁就有好幾幅圖版，不過書中關於自然科學、動、植物學的專業性較強，一般讀者恐怕不易了解。

¹¹⁰ 《萬國近政考略》(1901)，〈凡例〉。

¹¹¹ 同前文。

¹¹²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陳季同序〉，頁3a。

¹¹³ 鄒振環對此有非常好的描述：「《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是晚清地理學共同體成員之間產生聯繫，發生影響最大的兩本書，十九世紀四〇至五〇年代主要在地理學共同體中流傳，並首先在日本引起反響。一八五三年《海國圖志》六十卷本和《瀛寰志略》相繼傳入日本，有識之士如廣瀨旭庄、橋本佐田等對《海國圖志》不斷進行搜求和朱批；自一八五三年幕臣川路左衛門尉聖謨首命學者鹽谷世弘訓點翻刻開始，以後各種翻刻、訓解、和解、校正本，幾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一八五四年後的一、二年間，《海國

有人對書中的謬誤有所指陳。郭嵩燾在盛讚該書的成就和對明清以來的漢文西書「徵引浩繁」之餘，也不忘指出該書「有參差失實」之處。康有為一方面用《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作為講述西學的基礎，一方面也對兩本書的優劣之處作了比較：「《瀛寰志略》其譯音及地名最正，今製造局書皆本焉。《海國圖志》多謬誤，不可從。」¹¹⁴ 鄒弢在〈凡例〉中特別標出這兩本書，一方面反襯出二者在鄒弢編纂《萬國近政考略》的同、光之際持續不衰的影響力；¹¹⁵ 一方面也顯示在二書問世二、三十年後，連一個地方型的讀書人，也有能力對外在世界作更細緻、精確的呈現。西學的深入和普及，於此可窺見端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二年發行的五十卷本的《海國圖志》，將林則徐主持翻譯的《四洲志》全文八萬七千多字，全部重新分類收入；而《四洲志》所從出的《世界地理大全》，原來的英文書名已用了「百科全書」一詞：*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這本書由英國人慕瑞編著，初版於一八三四年在倫敦發行，此後又有多種增訂本。原書厚達一千五百多頁，介紹了亞洲、非洲、歐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地主要國家的歷史地理，¹¹⁶ 是一本名符其實的「百科全書」。雖然「百科全書」作為一個中文詞彙，大概遲至一八九七年，才由康有為由日本引進，但作為一種知識類別，卻早在一八六七年，就已經引起主持江南製造局翻譯工作的徐壽的注意。¹¹⁷ 而在實際內容上，鄒振環認為英國傳教士慕維廉 (William Murihead, 1822-1900) 一八五四年在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地理全志》，實際上就是一本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學百科全書。¹¹⁸ 但如果照前文的敘述，不論是就內容或標題來看，一八四一年刊行的《四洲志》已經可以算是半個世紀後盛行的各種百科全書的鼻祖。

圖志》的「訓點翻刻本」與「邦刻本」等便有二十餘種。《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大受歡迎。」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317。

¹¹⁴ 此處引文均轉引自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頁318-319。

¹¹⁵ 事實上，根據鄒振環的摘述，我們可以看出這兩本書，特別是《瀛寰志略》的影響力，持續到十九世紀末乃至二十世紀初葉；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頁320-322。

¹¹⁶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223。

¹¹⁷ 鄒振環，〈近代最早百科全書的編譯與清末文獻中的狄德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3：47-48。

¹¹⁸ 鄒振環，〈慕維廉與中文版西方地理學百科全書《地理全志》〉，《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51-59。

字數約當《四洲志》兩倍的《萬國近政考略》，共分十六卷，除〈天文考〉、〈風俗考〉、〈教派考〉等卷外，剩下的〈地輿〉、〈沿革〉、〈軍政考〉諸卷，基本上都沿用前人以各洲、各國為條目的方式撰寫。對條目的安排順序，鄒弢也採用了很務實的原則：「是書地輿、沿革、軍政三門，所排各國次序，間有不同。蓋地輿先亞洲而後他洲，其餘以地大國強為先。」¹¹⁹ 這樣的原則使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當時人心目中的大國名單。

《萬國近政考略》內文無標點，但條目清晰，每個條目約二、三百字，西班牙一條六百多字，美利堅一條則長達二千字，是比較特殊的例子。鄒弢對書中人名、地名的翻譯顯然甚為得意，特別說明是「照西士口音譯出，且或英或法，又各不同，閱者須當意會」。不過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鄒弢這些自矜標準的音譯，讀起來仍然充滿詰屈聱牙的蠻夷不馴之味，和《四洲志》、《海國圖志》的時代，似乎仍然相去不遠：

美利堅亦名合眾，俗名花旗。……明萬曆間，英人創浮及尼部，後三十年荷蘭人創紐約部。康熙初，地又歸英。旋英民又開曼歲去塞部。天啟間開牛海姆駭或名紐罕什爾部。荷蘭瑞典國人，又次第佔特拉回痕或名特拉華、牛久善或名牛執爾西等部。……逾十九年，英提督名賓有功國家，賜美洲新地居之，名曰賓西爾瓦尼亦名烹碑而浮泥部。雍正十年，又闢叫及也部亦名若爾治。

至乾隆三十八年，各部之桀黠者，又鼓動其間，民不能忍，咸有叛志，然尚未敢卒發也。又二年，暴政如故，民遂大會費拉特費，即非非勒代而非爺地方，公推華盛頓為將，力拒英人，而以曼歲去塞之保司登兵為首。又明年七月初四，檄告諸部，自立為邦，不歸英廷管轄。¹²⁰

初看這些文字，不論是詰聱的譯名，「今國中共分部四十三，又分疆六部」等行政區劃的術語，或「各部之桀黠者」、「民不能忍，咸有叛志」之類的修辭，以及中國紀年的使用，都給人一種熟悉的陌生感，好像講述的是新疆、蒙古等中國邊疆的歷史。但在這些看似熟悉或傳統的敘事手法外，鄒弢其實已在二千字內，從移民、獨立到建國、內戰，首尾俱足地勾勒出一個新興強權的歷史。條文中對推舉總統、創建民主、設立議院以及由奴隸制度引發的南北內戰和林肯遇刺等重大事件，作了要言不煩的交待，呈現出一個在中國脈絡中不曾存在過的新世界：

¹¹⁹ 《萬國近政考略》(1901)，〈凡例〉。

¹²⁰ 同前書，卷四，〈地輿考·美利堅〉，頁2a-b。

英廷無可如何，聽其自立，且與之盟，此華盛頓之功也。國既立，創為民主，由各部推舉總統自主之國，此為首創，他國未有。眾念華功，遂名京城曰華盛頓。從此定制。每部自立巡撫一人、副者一人，并設議院以佐之，均以四年為限。各部又公舉總統一人，裁主國事。京都上議院，每部例薦二員，一任六年，分為三班，次第入院，二年一調。班次下院，無定額，大約十七萬人中選保一員。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北方各省見傭奴受虐，議禁販買。時南方各省富人多以用奴起家，深資其力，聞議大譁，遂至本國南北交戰。美王林肯力持前議，大將格蘭脫崛起，亂遂平。然雖南人心懾，願訂禁奴公約，而林肯則被刺矣。¹²¹

除了對東岸大城紐約、波士頓的簡扼描述外：「紐約埠在紐約部東南，商民輻輳，帆船如雲。其次為曼歲去塞之保司登，富庶之休，蓋堪頡頏。」¹²² 對華盛頓的宮闕之美、百官之盛和國會大廈的圖書、文物收藏的描繪，更足以顯示十九世紀末葉，一個亂世文人對世外桃源和帝國都城的想像：

按華盛頓本為新都，嘉慶五年遷徙於此，樓臺壯麗、風景清華。鐵路、電線、工程，甲於天下。軍器廠、船政局、博物院、觀星臺及各部官衙，盡在於是。總統宮闕，皆白石築成，內有大殿，為召見百官之所。宴舞殿、紅綠藍殿，為接見親信大臣與各國公使之所，規模雄鉅。四面園亭，帶清流、蔭佳木，百花繁縟，林樹常青。居其中者有世外桃源之想。城中居民約十五六萬餘名。城之正中有廣廈一所，巍峨奇崛，中起圓樓，高十有八丈，內藏古今書籍、各國史記，約三十餘萬冊。樓下懸挂各畫，皆名人之筆，繪形繪神、惟妙惟肖，每幅值價數萬金。樓左右為上下議政院，明窗淨几，潔無纖塵。¹²³

在美國之外，鄒弢花了更長的篇幅，用四千字左右來介紹日本的沿革。不論是從篇幅或內容來看，都顯示出他對這個積極向現代化邁進的鄰國的重視。整篇文章從日本的開國神話開始，在朝代興替、戰亂叛逆之外，花了相當文字介紹漢語、儒學和佛教在日本的傳佈過程。對明朝之後，中、日、朝鮮的關係，也多所著墨：

¹²¹ 《萬國近政考略》(1901) 卷四，〈地輿考·美利堅〉，頁2b。

¹²² 同前文，頁3a。

¹²³ 同前文，頁3b。

時足利義滿執政，遣僧人朝貢中國，書辭恭順。明永樂帝封義滿為日本國王。後小松王不許，罷其職。迨稱光即位，上杉氏強奪鎌倉之權，高麗王遣戰艦一千三百餘艘，攻對馬島，不勝。中國使至，請彼此通好，未允。彥仁立為後花園天王，遣使中國。明宣宗遣內官雷春往報，贈銅錢三十萬緡。朝鮮王聞之，亦遣使與朝鮮立約互市。……自此商務相通，往來不絕，而將軍義勝及義政當國，皆稱臣於中國。¹²⁴

不過這個以中、日、朝鮮為主軸的敘事架構，隨著葡萄牙商船和天主教的到來，而頓然改變。在鄭芝龍、程朱理學之外，荷蘭人、英國人、俄國人、美國人相繼出現在長崎、下田等地的海岸。隨之而來的則是明治元年開始的各種改革：「明治元年改江戶曰東京，因國用不豐，命造紙幣。二年罷警蹕喝道，置議政院議員，以諸藩充之。創立電線，定府藩縣一制之例，廢公卿諸侯之稱。」「四年遣外務大臣伊達宗城至中國，立商約。……遣使聘歐美各國，准民人隨意散髮、脫刀，……許僧人食肉娶妻，設郵政局，置裁判所，創銀行及鐵路，攘琉球於中國，為沖繩縣」。「七年，……設女子公塾，又遣使議台灣事，獲償款而還。八年廢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審院，冬奪柯太島，與俄易俄之千島。九年遣使責問高麗，高王謝罪，乃與立約。十年減地賦及各種額金，自是而後，變更無常，均以富國為要」。¹²⁵

鄒弢在〈凡例〉中特別強調自己知識淺陋，所以本書「但尚考證」、「不尚論斷」。我們如果拿這裡的敘事，和錢恂對日本創建鐵路的用意所作的分析相比較，確實可以看出二人的差異所在。相較於錢恂對西學、洋務洞識全局的眼光，鄒弢將自己定位為洋務考證家，而不敢涉入西學，也不敢妄下論斷的態度，無疑是一種明智的抉擇。不過鄒弢在選擇素材和開展敘事時，除了有著化繁為簡的能耐，以及對細節的好奇和敏感度外，也不是毫無目的和寄託。這段關於日本沿革的敘述，雖然跳出本書設定的敘事年限，而向下延伸到甲午朝鮮之亂、中日開戰，以及「中國大受其創」的結局，但對明治維新內容、細節的摘敘，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要導出整個條目的下述結論：「按日本自行西法後，實事求是，心計極深，將來亞洲之中，當與俄國同稱巨擘也！」¹²⁶

¹²⁴ 《萬國近政考略》(1901) 卷九，〈沿革考·日本〉，頁9b。

¹²⁵ 同前文，頁10b-11a。

¹²⁶ 同前文，頁11a。

鄒弢以四千字的篇幅，藉著各種有趣的細節，將日本歷史從開國神話、列強叩關，一路講到明治變法維新，意趣盎然，可讀性極高，讓人領略到小說家的敘事本領。但更有意思的是，鄒弢或許是對自己念茲在茲，辛勤蒐羅所得的資料投入過深，無法忘情；或許是希望這些資料得到更大限度的利用，所以當光緒二十年，正籌措出版此書的同時，他又利用白話的形式，將類似乃至同樣的資料，寫入《海上塵天影》中。

小說的第十四至十六章，描寫主角韓秋鶴在自己效命的經略因病亡故後，痛失知己，大哭而歸，「雄心灰冷」，¹²⁷ 隨即展開了一段浪迹天涯的旅程。訪問的國家除了前述的歐洲、俄國外，還包括美國及日本，時間則約略從光緒十七到十九年。原來在《萬國近政考略》中，用精扼的文言敘述的〈地輿〉、〈沿革〉、〈軍政〉和〈洋務〉考，如今透過親身見聞的旅遊形式，藉著主角和海外華僑的對話，用更淺白延展的語言重新演繹一次。除了前述的砲臺分佈和彈道知識外，這裡可以小說中對美國、日本的描繪，作更進一步的說明。

光緒十七年（1891）三月，秋鶴坐的輪船抵達美國「嘉厘豐尼亞省，在三佛昔司克登岸」。借住在友人蕭雲處。蕭雲的父親原來在舊金山販運金沙，後因美國禁止華工，生意清淡，所以在日本開了一家新聞紙館。秋鶴就靠著這層關係，分別在舊金山和長崎有了落腳的處所：

是夕與蕭雲抵足談心，論美國商務國政。蕭雲道：「此國自華盛頓民主以來，國勢蒸蒸日上。商務以製造、耕種兩項為大宗。向來織布，往往用印度棉花，近五十年來，棉花反可運到列國。英吉利的織廠，大半購買美國的棉花呢！上年棉花出口，值價五千萬元，你想國中富不富？」秋鶴道：「弟向聞美國種田多用機器。糞壅之法，說用格致家的物料，又從秘魯運來一種鳥糞，曰爪諾，所以一人可種數頃之田，或麥或棉，獲利甚巨。前曾考究美國地輿志，說有四十二部，今看這等富庶，大約各處盡行開墾了。」蕭雲道：「卻不盡確，美國自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叛英自立之後，只有十三部，曰浮及尼，曰曼歲去塞。……此後又漸增行部。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又因擁奴一節，林肯為總統，南北交戰，格蘭脫平亂，更推廣疆域。」¹²⁸

¹²⁷ 《海上塵天影》（1993）第十四章，頁200。韓秋鶴就是作者鄒弢的化身。書中偶爾出現的「酒丐」之名，實即鄒弢的別號；見王學鈞，〈鄒弢《海上塵天影》的中西比較意識〉，頁138。

¹²⁸ 《海上塵天影》（1993）第十四章，頁201。

接下來，蕭雲歷數美國各州的州名，加在一起，正好是《萬國近政考略》中的四十三部，而非小說中爲了強化效果所說的四十二部。各州的名稱，不論是烹碎而浮尼或矮烏鴉、美恩、浮夢、牛海姆駭，則仍然如《山海經》中的地名一樣荒誕、遙遠。對火藥、礦石等西方藝學情有獨衷的秋鶴，並趁機炫耀了一下自己在這方面專門、古奧的知識。

這年年底，秋鶴從美國搭了一艘兵船回到香港，略事逗留，隨即轉往日本橫濱、長崎等地。抵達橫濱後，鄒弢藉著讓秋鶴閱讀《日本地輿形勢考》的安排，對日本的地理分佈，元朝人對日本的攻戰以及日本和朝鮮的交涉、和戰，藉題發揮了一番。

光緒十九年，秋鶴一行人從歐洲東裝返國。此時因爲日本出兵朝鮮，秋鶴的友人欲前往南洋籌餉招兵，秋鶴以中國進兵到日本的地圖相贈。圖中詳細載明了日本的地理險要，「連一屋一門一樹一石一澗一橋都記在上邊」，由中國到日本的水陸各道亦都注出。接下來六、七百字的敘述，雖然簡要，卻有了一絲英國人寫作《中國江海險要圖誌》的意味。而秋鶴於江邊送別友人的贈言，和日本沿革考的結語，相互呼應，反映出作者鄒弢從未中斷過的經世之心和對時局的關注：

弟此番已是倦游，就要回到家中，不再遠出了。你去須見機而作，能夠獨當一面最好，切不可受人的節制。現今日本學習洋人的法子，實心整頓，比中國可強數倍，不可以輕敵的，況且他不過與高麗為難，我們只好同他合保高麗，立一個私約，保全亞洲的大局。若必要同他失和，勝敗也不定呢。¹²⁹

王韜說本書「頗有經世實學寓乎其中」「徒以說部視之，亦淺之乎測生也」，證諸前引各項關於西法、新學的描述，可說是對本書的微言大義，作了最同情的辯解。小說與百科全書兩種文類互相參照的現象，既說明了清末百科全書在文類疆界上的開放、彈性，也反襯出西學知識的無孔不入，和作者的經世之心。

叁・結論

從上文的討論和鍾少華在《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一書中臚列的資料來看，一八九五年左右的政治局勢，顯然和百科全書這一新型態的知識類型的出現，有根

¹²⁹ 《海上塵天影》(1993) 第十四章，頁238-241。

本性的關聯。一九〇〇年代以後，百科全書的出版更達到高潮。但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卻發現，這一新型態的知識類型的出現，固然和甲午戰爭以後政局的演變有密切關係，卻不是甲午戰後一個突然出現的全新發展，而實與鴉片戰爭後，上層士大夫開始關注、引進西學有著不絕如縷的傳承關係。華格納教授 (Rudolf Wagner) 根據海德堡大學的百科全書資料庫所作的一份初步統計，就顯示從一八七二年以後，一些可以歸諸百科全書這個類別的著述已陸續出現。¹³⁰ 我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幾本著作，也顯示不少作者在出書前的洋務經驗，和他們在一九〇〇年代的出版有極大的關係。

像是錢恂，從一八九〇年代隨薛福成留歐期間，就已以公餘之隙，采問各國的政俗。而在此之前，從一八八三年起，錢就已經進入薛福成的幕府。¹³¹ 馬建忠在《藝學統纂》一書中對洋務和經世之學的見解，則和他一八八〇年後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實際參與洋務運動的經歷有密切關係。

鄒弢的《萬國近政考略》，讓我們更進一步，將一八九五年以後的百科全書和一八四〇年代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第一代介紹西學的論著，建立起系譜的關係。和陳季同、康有為一樣，鄒弢顯然是以《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作為立論和著述的參考點。

在《四洲志》、《海國圖志》與《萬國近政考略》這一條不絕如縷的西學譯介系譜外，由傳教士和清政府所創辦的學校、報紙、雜誌，以及一些「混血性的機構」——像是一八四三年創建的墨海書院、一八六五年創建的江南製造局以及一八七六年成立的上海格致書院——顯然也對一八九五年前西學在中國的深入、普及，有極大的影響。¹³² 鄒弢和葉瀚、葉瀾兄弟就是很好的例子。前文曾提到，《萬國近政考略》的資料來自三個管道：師承、教士和翻譯。鄒弢既是王韜的學生，又對教士之說和翻譯文章相當熟悉，我們可以合理的猜測，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每年定期出刊的雜誌《西國近事匯編》和格致書院出版的《格致匯編》，

¹³⁰ Rudolf Wagner, "A Preliminary List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1894-1911," 未刊稿。我要特別謝謝華格納教授惠賜這份資料。

¹³¹ 邱巍，《吳興錢氏家族研究》，頁34。

¹³² Natascha Vittinghoff 對此作了很精要的概述；見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都可能是他的資料來源。¹³³ 葉瀚、葉瀾的經歷、著作，更具體說明了格致書院在甲午戰爭前，已對轉型期的知識分子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一八九五年之前，近半個世紀累積的西學知識，對此後大量出現的百科全書的影響，還可以從一八六〇年代以後不斷出現的西洋游記著作中一窺端倪。這些著作——從斌椿於同治五年（1860）奉派游歐的《乘槎筆記》開始，到同文館出身的張德彝從同治五年起，在多次隨行、出使途中，陸續寫成的《航海述奇》、《歐美環游記》¹³⁴——雖然著述體例多以日記形式出之，與日後百科全書的體裁不同，但其中記載的各種地理知識、新興事務、風土人情和典章制度、日用民生、城市景觀，在內容上，已和日後的百科全書有許多類同之處。

在這個從一八六〇年開始的西洋游記類型中，袁祖志的《談瀛錄》和王韜的《漫游隨錄》特別值得稍作分析，原因是這二人混雜著江南文人和轉型期知識分子的經歷以及其著作，都和本文所討論的鄒弢類似。二人又都以上海為主要的社交、著述場合，也都和鄒弢有著或師或友的個人關係。

如前所述，鄒弢西學知識的三個來源之一——得自師承——指的就是王韜。而王韜以同治九至十二年（1867-1870）的游歐經驗寫成的《漫游隨錄》，從光緒十三年（1887）年開始，在《點石齋畫報》上陸續連載了兩年，引起極大的迴響。在此之前，王韜更在同治十五年出版了《普法戰紀》一書，成為介紹西方政治情勢的第一批中文著作。¹³⁵

¹³³ 根據 Vittinghoff 的綜述，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一八六八到一九一二年存在期間，大概有十位包括傅蘭雅 (John Fryer) 在內的教員，及二十位包括華蘅芳等人在內的譯員，翻譯部門則負責出版《西國近事匯編》。這份雜誌只登錄譯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倫敦《泰晤士報》的新聞，是中國士大夫獲知世界重大事件的主要參考來源，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其讀者。格致書院則是以倫敦工藝技術學院 (Polytechnical Institution) 為其楷模。格致書院的英文洋名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就充分反映了其間的關聯。書院內有教室、圖書館和展覽廳，定期出版《格致匯編》，是有志西學者的重要社交俱樂部；見 Vittinghoff,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p. 93-96.

¹³⁴ 這些游記，包括林鍼的《西海紀游草》、斌椿的《乘槎筆記》、志剛的《初使泰西記》，張德彝的《航海述奇》、《歐美環游記》，都收在鍾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中。這套書第一輯共有十冊，此處所提到的幾本書，都收集在第一冊。鍾叔河也分別為這些書寫了導言。

¹³⁵ 參見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9 (2006)：7-9。

這些著作，或是帶有游記的性質，或是對西方的文化與政治發展有全面的介紹，和鄒弢同時兼顧文學與西學的特色一致，也難怪王韜在為《海上塵天影》寫序時，對全書的宗旨多所闡述。以出書的年代先後，和二人對師生關係的強調來推斷，我們不難想像王對鄒的影響，並可進一步推想王韜所代表的一八七〇及一八八〇年代的同光西學或西方認知，對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代百科全書的編纂所產生的影響。

和王韜的《漫游隨錄》相比，袁祖志的《談瀛錄》似乎未受到學者太多的重視。但不論就作者還是論著來看，都有值得一提之處。袁祖志是袁枚的孫子，咸豐時曾官縣令、同知，後寓居上海。一八七六年出任上海第一份官方報紙《新報》的主筆，和以《申報》為中心的滬上文壇何桂笙、錢昕伯等人交誼甚篤。¹³⁶光緒九年（1883）三月，上海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奉李鴻章之命，前往歐洲各國考察招商局業務，袁祖志奉命同行，前後十個月內，考察了十一個國家。回國後不久，將考察筆記集結成書，在光緒十年交由上海同文書局出版。¹³⁷在十個月的海外旅遊中，袁祖志常常寫詩題贈給滬上的政商名流和文化界名人，鄒弢也赫然在列。¹³⁸

從鄒弢和葛元照、錢昕伯、何桂笙同列袁祖志的贈詩名單中，可以想像二人的交誼顯非泛泛。但過去對鄒弢上海交游圈的討論，對此或是一筆帶過，或是略而不提。事實上，從《談瀛錄》中的資料來判斷，鄒弢和袁祖志的交誼大概還超過過去的瞭解。《談瀛錄》共分六卷。除了前四卷是海外見聞雜記外，卷五〈海外吟〉，收集了前述袁祖志出洋考察途中題贈國內友人的詩作，大多數和域外景物並無太多干係，純粹是感懷之作。¹³⁹卷六〈海上吟〉，則更和十個月的出洋考察全無關係，而是前此以上海冶遊、逸樂為主題的記事詩，卷前有葛元照等人的題詞，題詞前復有兩篇序文，其中第一篇序文，即是鄒弢所寫。這篇序寫於光緒七年，全文古奧雕琢，頗符合鄒弢「瘦鶴詞人」的舊式文人風格。¹⁴⁰在這個一八八〇年代，由上海報人／文人組成的社交圈中，袁祖志大概是少數既有科

¹³⁶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頁7，註2。

¹³⁷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頁7；袁祖志，《談瀛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刊本），〈唐廷樞序〉，及序後題詞。

¹³⁸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頁7。

¹³⁹ 同前文，頁19。

¹⁴⁰ 見《談瀛錄》卷六，〈海上吟序〉。

名，又有實際仕宦經歷的功成名就者。他會請鄒弢為自己的〈上海記事詩〉寫序，既可能顯示了兩人交誼的深厚，也可能是因為鄒弢在詩詞創作上，確實已贏得同儕文人的肯定。但不論如何，以二人的交誼關係，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二個人可能也同時在對時務實學的關注上，互相影響。

《談瀛錄》於光緒十年出版，比《萬國近政考略》早了十幾年。該書出版後，似乎成為當時上海文化圈的一件大事，文人賦詩歌詠者不斷。三年之後，另一家上海的書局「管可壽齋」重印此書。¹⁴¹ 出版的盛況，和《萬國近政考略》可前後媲美。

在《申報》上刊登的這些文人唱和之作，固然增加了這本游記的能見度，並達到促銷的目的，但作品內容的引人入勝，可能是讓這本書受到歡迎的主要原因。和前述諸游記以日記體為主的形式不同，《談瀛錄》的某些章節已經有了以專題敘事的取向，雖然體例各章不一，而無法做到《萬國近政考略》和其他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代的百科全書那種綱舉目張的程度，但每個標題以幾百字，乃至一百字上下不等的篇幅，勾勒出大致的輪廓，其精神已與日後的百科全書相彷彿。而對異國風俗和各國城市、生活的介紹，趣味盎然，又深深具備旅遊文學敘事引人入勝的特長。

以卷一〈瀛海探問〉為例，分別介紹了英、法、德、和（荷）等西方列強。每個國家先對其都城作概論的綜覽，然後分為政令、民俗、武備、物產等各項做簡要的介紹。在「法都巴黎」項下，作者如此描述：

法蘭西之京師也，介居英德荷義之間，東西南朔，平壤居多，無甚高山大川，幅員不廣，而稱強海外，久樹一幟。民生繁庶，土地肥沃，以首善之區而論，氣局宏闊，市肆繁華，誠可首屈一指。然政令煩苛，物價昂貴，居大不易之嘆，恐有甚於長安也。¹⁴²

政令項下，則以簡扼的敘述，切中政體的核心：

本為君王之國，自經德國挫敗之後，改為民主之國。其主四年一更，由民間公推，稱為伯理璽天德。虛擁高位，毫無權柄，一切國政，皆歸議政院主持，議既成，但請伯理璽天德畫諾而已。一既退位，遂與齊民無異。¹⁴³

¹⁴¹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頁19-20。

¹⁴² 《談瀛錄》卷一，〈瀛海探問〉，頁8a。

¹⁴³ 同前註。

如此簡要的敘述，和葉瀾、汪榮寶在一九〇三年編的《新爾雅》一書中類似條目的呈現相彷彿，卻多了一份遊客和文人的悠遊之趣。

文學性西方游記和一八九〇與一九〇〇年代的百科全書的關係，顯然是我們在討論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西學系譜時，不能忽略的課題。

在時間上，百科全書的大量出現，和前此的西學論述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代表了西學知識的深入和普及。從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開風氣之先的上層士大夫，向下擴及到許多在仕途上受挫的外交官、擁有最低科名或沒有任何科名的新型文人，以及像葉瀚、葉瀾兄弟一樣，由生員轉向留學生的知識分子。就空間分佈而言，百科全書的作者，從我在前文中約略的討論中初步統計，多集中在江蘇（馬建忠、江榮寶、鄒弢、丁福保、丁祖蔭、徐念慈等）、浙江（錢恂、董鴻禕、葉瀾），少數人像陳壽彭則來自福建。這份名單雖然不全面，但和 Natascha Vittinghoff 對一八六〇至一九一一年間，上百位廣義的科學家、翻譯者和新聞工作人員所作的出生地分析，大致吻合。這些被 Vittinghoff 稱為進步或有影響力的新學傳遞者，多數來自沿岸及江南各省。這些地區——像是浙江、江蘇、湖廣——由於和通商口岸相連結，所以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響。¹⁴⁴

這些來自同一區域的百科全書家，或是彼此相識，或是從事類似的文化事業，往往互相援引，在家鄉或上海結成網絡。有些人——像錢恂、董鴻禕——更因為血緣、姻親關係，而先後致力於啓蒙的事業。另外一些人——像葉瀾、董鴻禕、汪榮寶——則因為留學日本，而建立了一個以早稻田大學為據點的激進革命基地。

就像我在這篇文章一開頭所說的，從十九世紀初葉到一八九五年間為止，西學的輸入，有著一個從邊緣到中央的演變過程。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代的百科全書熱潮，顯然是過去將近一個世紀西學輸入成果的總驗收。過去的研究，一方面忽略了鴉片戰爭之前，西方思想在中國邊緣地區的傳播；一方面也忽略了鴉片戰爭之後，甲午戰爭之前，半個世紀間，西學在中國內地逐漸傳衍、流佈的過程和影響。從百科全書這個據點切入，顯然有助於我們對後面這個問題重新省思。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幾十年間，學界對洋務運動的研究，或是集中於上層，或是集中於個別的建構、機制，對上層官僚士大夫的指導理念，如何透過江南製造局、格致書院、報紙、雜誌、翻譯書刊等建構、機制向下傳佈的流動過程，缺少關注。本文所分析的幾個範疇的百科全書作者——外交官、維新派、留

¹⁴⁴ Vittinghoff,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 104.

日學生、新型文人——恰好可以彌補這個西學傳遞、流通、縣衍過程中的空缺。

和林則徐、魏源等人相比，這些百科全書的製作、編撰者的一個最大共同特色，就是他們絕大多數被摒棄於傳統的科舉仕進之途之外，在通過秀才這一個基本關口後，就被迫轉向時務和西學所提供的另一條看起來也充滿了可能性的晉身之階。和鴉片戰爭前絕大多數無法在科舉仕進之途攀爬的下層文人不同的是，他們可以不必只以塾師、地方儀式專家、教派領袖、幕友或戲曲、小說及淫詞小曲的撰寫者為主要的出路，而在出使、駐外、留學、新興的啓蒙事業或上海文化圈，找到另外一個性質迥然不同於傳統文人的洞天。

就像百科全書在發展階段，格式、內容游移而難以精確統一界定一樣，百科全書的作者在這個轉向新的晉身之階或謀生之道的過程中，對新的身分認同或自我感覺，也沒有一致、統一的傾向。不論是從包天笑的夫子自道或 Vittinghoff 的分析當中，我們都不能說這些在科舉仕進之路上挫敗的文人士大夫，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的邊緣人。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又看到像鄒弢這樣為貧窮所困，在新／舊、文學／時務、傳統／現代中游移、擺蕩的文人。相對於包天笑在上海所獲得的聲名和實質利益，鄒弢的擺蕩、游移，讓我們在同一個新型文人的範疇下，看到更多的光影。這些大體上在傳統舉業受到挫敗的士人，因為不同的際遇，而以不同的方式切進西學。切進西學的不同路徑，也使得他們編纂的百科全書，呈現出不同的風貌。錢恂因為長期出使各國的經驗，讓他的作品比其他根據口耳之傳或資料編纂所成的作品，既多了許多即時、生動的細節資訊，也多了一份盱衡全貌的能力。馬建忠長期投身洋務運動的經驗，則讓他在編纂《藝學統纂》時，更加注意堅船利砲和厚生、稼穡之學的技術性知識。相較之下，鄒弢這位對傳統詞章、治遊和文學更多迷戀的江南文人，在向時務、實學轉進的同時，則多了一份落魄文人、駢麗詩文和艷情小說給人的俗艷之感。在整體取向上，更近乎《點石齋畫報》新舊交雜的詩文、圖像所營造出來的混雜氣息。

這些人雖然在政治信念、專業訓練和立身謀生的技能上各自不同，卻共同為晚清的知識分子開闢了一片嶄新而醒目的新疆域，並藉著一套新的書寫類型，為近代中國建立了另一種可能的啓蒙之道。他們充分掌握了時代動向和市場需求，一方面總結了前此的西學知識，一方面也為五四時代的科學、民主、男女平權，和西方物質文明的優越性等新思潮，作了發凡奠基和潛移默化的工作。

（本文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四日收稿；九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福保，《衛生學問答》，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文明書局印行本。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第48種。
- 甘韓，《皇朝經世文新增時洋務續編》四十八卷，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十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第801種，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掃葉山房活字版排印本影印。
- 甘韓、楊風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二十一卷，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商絳雪齋書局石印本影印，1979。
- 何良棟輯，《泰西藝學通考》，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鴻寶書局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
- 汪榮寶，《汪榮寶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叢書由天津古籍出版社發行，1987。
- 汪榮寶、葉瀾，《新爾雅》，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四十四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第434種。
- 汪榮寶、葉瀾，《新爾雅》，東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實藤文庫藏一九〇三年原刊本。
- 徐念慈，《博物大辭典》，上海：宏文館，1907。
- 袁祖志，《談瀛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刊本。
- 馬建忠，《藝學統纂》，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文林書局刊本，1902。
- 陳壽彭譯，《中國江海險要圖誌》二十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廣東廣雅書局重印本。
- 葉瀾，《天文地學歌略》，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間廣州寶經堂藏版。
- 葛士濬主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一百二十卷，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及石印本影印，1979。
- 鄒弢，《三借廬筆談》十二卷，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上海：進步書局，出版年不詳，第七輯，第4冊。

李孝悌

鄒弢，《三借廬集》四卷，常熟：開文社印刷所，1932。

鄒弢，《海上塵天影》六十章，收入《晚清豔情小說叢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鄒弢，《海上塵天影》六十章，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1904）石印本影印。

鄒弢，《萬國近政考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借廬校印本。

鄒弢，《萬國近政考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一九〇一年三借廬藏本。

錢恂，《五洲各國政治考》，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

錢恂，《五洲各國政治考續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

錢恂，《吳興錢氏家乘》，收入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心編，《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第34冊。

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第一輯，第1冊。

Langdon, Charles Henry Clarke, ed.,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COMPRISING THE COASTS OF CHINA FROM HONG KONG TO THE KOREA; NORTH COAST OF LUZON, FORMOSA ISLAND AND STRAIT; THE BABUYAN, BASHEE, AND MEIACO SIMA GROUPS. YELLOW SEA, GULFS OF PE-CHILI AND LIAU-TUNG. ALSO THE RIVERS CANTON, WEST, MIN, YUNG, YANGTZE, YELLOW, PEI HO, AND LIAU HO; AND PRATAS ISLAND*. London: Hydrographic Office, 1894-96, 3rd ed.

二・近人論著

丁鳳麟

1998 《薛福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牛亞華、馮立昇

2004 〈丁福保與近代中日醫學交流〉，《中國科技史料》25.4：315-329。

王汎森

2003 〈「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頁181-194。

王爾敏

1980 《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王學鈞

2004a 〈王韜〉，蕭相愷主編，《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頁808-817。

2004b 〈鄒弢《海上塵天影》的中西比較意識〉，《明清小說研究》2004.2：134-143。

王曉秋

1989 〈清末政壇變化的寫照——宣統年間《汪榮寶日記》剖析〉，《歷史研究》1989.1：73-84。

米列娜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2007 〈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橋：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 (1911)〉，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35-154。

呂文翠

2006 〈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9：5-48。

李仁淵

2005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

李孝悌

2001 《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長莉

1993 《先覺者的悲劇——洋務知識分子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李華川

2004 《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沈國威

1995 《『新爾雅』とその語彙：研究・索引・影印本付》，東京：白帝社。

岳峰

2001 〈東學西漸第一人——被遺忘的翻譯家陳季同〉，《中國翻譯》2001.4：54-57。

林怡

2004 〈簡論晚清著名閩籍女作家薛紹徽〉，《東南學報》2004.增刊：282-285。

李孝悌

林東源

2006 〈陳衍的經濟思想解讀〉，《商業時代》2006.27：110-112。

林慶元

1999 《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增訂本。

邱巍

2005 《吳興錢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

時萌

1986 《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郝秉鍵、李志軍

2005 《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高毓秋

2003 〈丁福保年表〉，《中華醫史雜誌》33.3：184-188。

張灝

1978 〈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480-482。

陳平原

2007 〈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頁155-192。

湯志鈞

1993 《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馮自由

1953 《革命逸史·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黃克武

1986 〈經世文編與中國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86-87。

鄒振環

1998 〈近代最早百科全書的編譯與清末文獻中的狄德羅〉，《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3：47-52。

2000a 《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b 〈慕維廉與中文版西方地理學百科全書《地理全志》〉，《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51-59。

- 熊月之
1994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
- 齊國華
1994 〈巾幗放眼著先鞭——論錢單士厘出洋的歷史意義〉，《史林》1994.1：34-40。
- 劉世龍
1983 〈清末上海格致書院與早期的改良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4：45-52。
- 蔡少卿
2005 〈薛福成日記·序言〉，《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2：14-17。
- 蕭相愷
2004 〈鄒弢〉，《中國文言小說家評傳》，頁830-849。
- 錢南秀
2002 〈清季女作家薛紹徽及其《外國列女傳》〉，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932-956。
2006 〈中典與西典：薛紹徽之駢文用事〉，程章燦編，《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頁582-612。
- 薛玉琴
2006 《近代思想前驅者的悲劇角色：馬建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鍾少華
1996 《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
-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and M. Henri Day
2007 “An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edia (1911): An Unfinished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odern European Culture”，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中國近世的百科全書」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10月5-7日。
- Elman, Benjamin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nku, Andrea
2004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1-3: 68-91.

李孝悌

Vittinghoff, Natascha

- 2004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p. 75-118.

Wagner, Rudolf (華格納)

- "A Preliminary List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1894-1911." not published yet.

Late Qing Encyclopedists: Establishing a New Enterprise

Hsiao-t'i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1900s onward, we can observe a clear trend toward the “populariz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This process is seen not only in what I have called the turn-of-the-century movements to “bring knowledge to the people” and “enlighten the lower classes,” it is also apparent in the many textbooks and encyclopedias which flooded print markets beginning in the 1900s. This article aims to giv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both the authors/compliers and contents of these encyclopedias.

In this paper, I divide encyclopedia compilers into four general groups: (1) diplomats and gentry elites; (2) reformers; (3) students in Japan; and (4) new-style literati. Although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se groups, there are also points of overlap, and some compilers even simultaneously belong within two or three of the categories. From each group, I have chosen one or two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bout whom we can find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detailed materials, and have undertaken in-depth discussions about them. Ultimately, I hope to place these encyclopedists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as part of a larger analysis regarding both the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regional networks formed by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late Qing.

Because the encyclopedi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ere compiled when the encyclopedia-form was still in its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y evince shifting formats and contents, which make precise and/or general definition impossible. Similarly, the statuses and identities of encyclopedia authors/compiler are far from homogenous. However,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beliefs, level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areer choices of these encyclopedists, they, as a group, inaugurated a new field of inquiry and activity for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book-form they produced created another possible path to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 With a thorough grasp of social trends and market demands, encyclopedists summarized Western learning of the past and established a deep, lasting, and ultimately invisible basis for new tendencies in thinking about science,

李孝悌

democracy,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material culture which were to become popular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Keywords: encyclopedia, populariz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Shanghai, publishing, new type of knowledge